

記憶

REMEMBRANCE



1975年4月17日 红色高棉夺取了全国政权。毛泽东发去贺电：
“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1月7日第1期 总第245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45 期

波尔布特政权终结 40 周年纪念专辑

【编者按】

王晓林 丧钟为谁而鸣？

【专稿】

王晓林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蓝海鸥 一份无法回避的时间表——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

【资料】

本·基尔南 2005 年在“柬埔寨有计划灭绝屠杀”专题研究组成立时的讲话

美国设立“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国家纪念日”的政府令及美国总统宣言

【评论】

铁 镝 Killing Field——共产主义屠宰场

桑钟鸣 “中越边境反击战”的目的何在？

【文摘】

何 方 毛泽东与世界革命

何 方 毛泽东的战争思想与共和国成立后打的四场战争

何 方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美）加雷斯·波特 中国和越南在东南亚的冲突

【资料】

毛泽东、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乔森潘、英萨利的谈话（1974-4-2）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谈话记录（1975-6-21）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摘录（1980-8-21）

【本刊声明】

【编者按】

丧钟为谁而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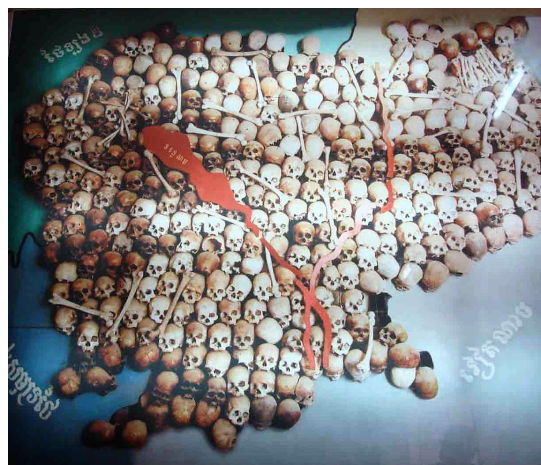
本期客座主编/王晓林



1979 年 1 月 7 日，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土崩瓦解的日子。此人及追随者（其中包括中国驻柬大使孙浩）正是在这一天从金边狼狈逃向泰柬边境的原始森林。虽然这些人组成的政体以各种名头又勉强维持了十多年后才从世界政治舞台彻底消失，但这个日子却早已被柬埔寨王国政府正式规定为全体国民休假一天的重要国家纪念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记忆》在这个日子里出版这一专辑，谨以此表达对柬埔寨人民近半个世纪前所受巨大创伤的无限同情和死于这场浩劫的 30 万中国侨胞的深切怀念。

本专辑除了重现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也浅涉 1979 年 2-3 月那场所谓“中越边境保卫战”的去脉来龙，希望能给学界，尤其是国际关系、国际共运研究学者提供一种非官方的看法和立场。

无论如何，在“共产主义”之名下发生的这一次对本国国民的灭绝性屠杀，和对中国国民的灭绝性屠侨，全中国、全世界每一位有良知的人们都有铭记它，并以它警醒后人的义务。



【专 稿】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王晓林

每年的 1 月 7 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但这个国家节日却有着一个骇人的名字——大屠杀逾越日（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实际上这是 1979 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明和最血腥的大屠杀嘎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1970 年 3 月 18 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们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 50 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沙罗绍特”。这是他第 N 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 年 4 月 30 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 1969 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

轰炸，一直持续到 1973 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 B52 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 月的政变和 4 月的入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 年 3 月 29 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 4 月朗诺逃往国外，17 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从 1970 年 3 月到 1975 年 4 月，经历了 5 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而这却只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 年 4 月 17 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 10 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就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 200 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 CHUM MEI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

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 7 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一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



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回忆的这次大迁徙，导演者就是“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这个本名沙洛特绍，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 年 3 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 20 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六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九岁出家当和尚，12 岁还俗，直到 15 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 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 1950 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 年 8 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 年 7 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 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 1953 年 1 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 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但是，越南人的撤出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

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 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1957 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 年 9 月 30 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 11 个人，其中 9 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 1000 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1962 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 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亦既红色高棉。1963 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 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分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 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于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 2 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邓小平、彭真等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 1965 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他，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 1974 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由此茅塞顿开。1970 年 3 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上历史舞台，变成革命伟人了。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领袖，

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新纪录，先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 年的 4 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请听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真可谓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趸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却还来不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为戴眼镜丧生的人数不胜数；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

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 年 6-8 月，沉痾中的周恩来在北京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和

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和对自我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早先从中国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 3 年零 6 个月的短暂的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 9 次大清洗，大大超过了他的中国老师“七八年来一次”的频率而达到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更是达到了彻底的不可理喻，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



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详的气息，1976 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从肉体上被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除总长宋成以外全部被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 1997 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 11 口成员全部杀光。

波尔布特为其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亲历文革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 Svay Prey 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 12 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

的 S21 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 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9 年的 5 个年头里，超过 2 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则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 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



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 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

1979 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 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

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 14 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 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1 被放弃的时刻，监狱长康克由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和

S21 相比，钟屋的“此处无人生还”毫无悬念。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来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囚室，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 DDT 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 DDT 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程序地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接铲断头颅、勒毙或吊死。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浓烈的 DDT 的和重噪音的喇叭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奸污他们的母亲并杀死裸体的她们。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嵌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成

为处决人犯的刽子手，否则只能落得被处决的下场。这些狱卒最小的只有十三岁，最大的

也就是二十三、四岁。（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1980 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 8589 具遗骸。1988 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明的 129 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 43 个尚未挖掘。巴郢邦、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全国已经探明的群葬 2 万多个，只是没有象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在

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 2 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 1978 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原因。柬埔寨的华人在 1975 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 60 万，而在 1979 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 30 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换句话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全权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旋即发生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于“4·17 金边大迁徙”一年，1974 年 4 月 28 日就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在 1975 年 4 月金边大疏散的 200 多万人中有大约 40 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无法向祖国呼救，他们绝望的哭声无人听见。最为残忍和卑鄙的是，彼时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门前竟然竖起“华人资本家不得入内”的大幅招牌，活生生地把千千万万同种同族的侨胞直接推进人间地狱！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

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 1976 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已被屠杀殆尽。

在那几年中，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风莲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莳花弄草，时而被这一位或那一位高层人士接见，一派莺歌燕舞，含情脉脉。该同志大有取代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成为银屏新星之势。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没有去看过 S21 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 年圣诞节，越南 10 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战争动员居首的口号就是“拯救越侨，为同胞报仇”。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泰柬边境丛林。1979 年 1 月 7 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而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屠杀，驱散了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难觅先例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浩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他们一行七人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在雨中睡觉，最后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 47 天。这些外交官们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 2005 年 1 月 15 日《扬子晚报》）。2 月中越战争爆发，17 天后结束。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 3 年零 8 个月的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几乎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 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它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它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它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更是创造了世界记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 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

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死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是兽性在向人性挑战，这是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的种族自杀（Autogenocide）。如此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 20 世纪 70 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上，原载《炎黄春秋》2008 年 4 月号）

波尔布特 并不遥远的教训（下）



“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自古就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请键入美国耶鲁大学网页“Genocide Studies Program（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研究项目）”，用 CGP 三个字母做为关键字去搜索，这是“柬埔寨大屠杀项目（Cambodia Genocide Program）”的缩写，让我们以它做一个历史并哲学的切片，做一次我们所属物种的性质——人性的观察。

一个 600 万人口的小国，45 个月内，三分之一的生灵涂炭。残害、刑虐和杀戮成为社会常态，浩劫过去没有一个家庭是完整的。一个上台后并没有遭遇任何反抗的政权在转瞬间以革命的名义屠杀了 200 万人，即使从动物学的角度讲也不可思议。对于中国它还意味着更多一重的苦难和耻辱——在“屠侨史”上也创造了世界纪录的这场浩劫中，三十万华侨在“消灭有钱人，消灭阶级”的呼啸声中像牲口一样地被宰杀了。

站在钟屋杀人场曾经的血与白骨的泥淖中，人们所有关于“人类”的经验和知识都已苍白，剩下的只有从常识和直觉出发的、对“革命”与“人性”的重新思考和定义。

在中国，“革命”把没有几个民众能够理解的各种激进学说、思想和主义高度凝练为

一个人人都能听懂的词汇——“造反有理”，创造性地将苏俄已经狭义过的革命再狭义到极致，然后以煽动仇恨的手法将其普及到民众，彻底截断了走英国“光荣革命”或美国“民主立宪”道路的希望。而可怜的柬埔寨原是最有希望走这条道路的国家。

上世纪中期，“革命”一词与“独立解放”紧密相关。和美国当年向英国人闹独立一样，柬埔寨也不甘做法国殖民地，高棉人也要革命。1952 年，三十而立的国王诺伦敦·西哈努克发起“皇家独立十字军东征”。在这面充满血腥和浪漫意味的旗帜下却并没有真正的流血发生，温文尔雅、西方和贵族味道十足的国王凭着他的个人魅力在西方各大国之间旋风般地游说——“要么让柬埔寨独立，要么让这个国家被共产主义吞噬。”美国在这一危言耸听的立论下进退维谷，想“两害取其轻”却在孰重孰轻之间犯晕。而战后尚未洗清投降者耻辱的法国人，在看到这位年轻的国王当真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了总部和鹿砦，摆开决裂的架式，竟立刻乖乖地交出了政权。这位酷爱演戏的年轻君王居然真的兵不刃血，单枪匹马，“皇家独立”地完成了“十字军东征”，他的王国戏剧性地于 1953 年独立。

公平地说，西哈努克是个好国王。做为一位小国之君，几十年来他在东西方冷战的夹缝中，在两大意识形态板块的挤压中历经劫难，受尽屈辱，殚精竭虑，九死一生。柬埔寨原本是有可能成为东方瑞士的国家，和平、发展、逐步演进，大不了搞搞颜色革命，非暴力不合作。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土壤生出了极其血腥的故事。这是西哈努克一生中最大的失误——姑息了波尔布特势力，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了无法收拾的泼天罪恶。

有关波尔布特近 50 年的革命生涯的过程过于冗长，本文仅希望能像一份试验报告，看一位从小连杀鸡都不敢看的小僧侣在革命的熔炉中如何被冶炼成连人尸也要再屠杀的狂魔——失势前的波尔布特曾亲自下令将他的战友、柬共军事将领宋成全家 11 口被处决后的尸体用卡车碾碎。这是一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近于完美的菌株——人性在革命中如何变幻、异化并最后回归兽性的标本。但是分析出这一可怕嬗变的全过程依然是困难的，除了耶鲁大学的 CGP，我还没有发现亚洲哪个国家有类似的研究，中文资料更是少到几乎没有。

波尔布特并非张献忠、刘宗敏式的流氓无产者，而是僧侣出身并曾赴法留学的皇亲国

戚，他的姐姐沙良是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的爱妃。不幸他的留法生活很不顺心，赴法不久就由于成绩低下而丢了政府的奖学金，潦倒到居无定所的地步。4 年留学结束他没有拿到学位和文凭，以至被同学和后来的战友讥讽为“没有法兰西深度的，不入流的”东方人，是一个“根本无法结交朋友的人”。晚年的波尔布特自己也承认由于学问和法文都不如人，他在留学生中寂寂无闻。一个人在求学期受到的心理创伤和由此引起的自我价值感降低，多会导致性格的扭曲并影响一生，这种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尤其是无限的权力，潜意识中的嫉妒和仇恨会猛烈爆发，造成惊人的破坏力，这种例子在东方尤多。

法兰西是个革命的输出国。200 年前她诞下过一只叫做“雅各宾党”的怪蛋，孕育了革命的始祖鸟，生出马拉、丹东、罗伯斯皮尔这样的革命怪物，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一词。中国和柬埔寨都是法国革命的输入国，许多曾经的领袖都是这只始祖鸟的后裔——海归的革命博士。从柬埔寨回来后我曾冒昧地向一位曾在 1975 年出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官员的女士探寻她对波尔布特政权时期大屠杀的看法，我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波尔布特吗？他是个风度极佳的好人。想要解密柬埔寨问题吗？你就别做梦了。”

这个回答几乎是我下决心要以一己之力做点什么的最初动力。在悲哀和忿懑中我写下文章《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 年 4 月号上，同时开始搜集柬埔寨大屠杀的资料和影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我尽可能多地复印、扫描和抄录了有关这场大屠杀的文字资料。在阿拉巴马州亨兹维尔华人教会的帮助下，我联络上了在美柬埔寨的华侨组织，采访了大屠杀的幸存者。这些幸存者多是在 1979 年越柬边境的热带丛林峻岭中，在已毫无生还希望的绝境中由美国军方派出的直升飞机救出来的。他们那时真的以为这些美国人就是天使，这些飞机就是天使的翅膀。

有一位和我交谈近两小时、名叫王荣的原柬埔寨华侨就是这些难民中的一位。当年只有 13 岁的他常常在地头田边就亲见杀人，那些血腥的场面令他多年不能安寝。他对我说，我和你谈这一两个小时，大概得有几天无法入睡。要不是看到你的文章（指《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我是不会接受你采访的。我们这些人不能提起那些岁月，这就像刚刚

长好的伤口又被撕开，再撒上一把盐。这令呆若木鸡的我无法说出抱歉和安慰的语言。更多的人是不愿接受采访，采访王荣后我才知道，他们不是不想谈，而是根本无法与人交谈。

有关“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项目最初的调查都是由西方新闻媒体和学者进行的。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和英国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就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研究成果的书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Phillips Short 的《波尔布特：历史的噩梦》（巧的是他的成名作是《毛泽东》）、Ben Kiernan 的《波尔布特政权 1975——1979：红色高棉统治下的种族，权力与屠杀》、David P. Chardler 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的政治传记》，Michael Hass 的《柬埔寨，波尔布特和美国》，Kuehnelt Leddine 的《左派再临：从萨德、马克思到希特勒、波尔布特》等。这些著述从各种角度分析波尔布特政权以及波尔布特其人在历史中出现的因果关系，其中不乏截然相对立的观点，但对于大屠杀却无人否认。

波尔布特或柬共却没有遗留下来什么理论甚或文字能供人们分析，我也只找到一本澳大利亚学者 David Chandler 收集和编著的《波尔布特小红书——安卡如是说》，这是他在大屠杀过后的柬埔寨经年收集和研究的成果，非常粗糙，却是柬埔寨的“红宝书”。它用英、法、柬三种文字收集了波尔布特语录，包括集会口号、标语、仪式用语、歌曲、士兵和市民用的口号、劳动时的口号、对民众的恐吓与威慑策略、庆典礼仪上的规则等等。

先说什么是安卡。你在百度和谷歌里都查不到的安卡（Angkar）其实很简单，就是中国人熟悉的“革命组织”。在 45 个月的执政期内，波尔布特就是安卡。安卡总控柬埔寨全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如果还算有的话）和精神生活。它是立法机关和政权，也是法庭和行刑队。它是社区、党部，也是宗祠和家庭——党和革命的大家庭。它是主人和家长，也是酋长和族长。它可以安排和拆散婚姻，可以对一切人生死予夺。我前边提到的王荣就多次在现场亲见安卡处死自己的亲人和乡亲，罪行多是干活偷懒、偷吃、生病等等，妇孺老残都不饶恕，开膛的、剖心的、挖肠的、砍头的、断肢的……

安卡（即波尔布特）都说了些什么，抄录一些在下：

“我们应当强迫他们用自己的手工作以便将他们变为新人！”

“不积累财富就不会失去什么！”

“宁可错抓一千，不可错放一人！”

“多一人不如少一人！”

“拒绝就是敌人，反抗就是尸体！”

“一切权利绝对归安卡！”

“尊重集体，瓦解个体！”

“超大跃进！”

“清算过去！”

“自力更生！”

“节约！”

“抵制西方消费品！”

“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

“学院和文凭毫无价值！”

“君主制是时代的错误”……

安卡就是“老大哥”，它能“看到一切，了解一切”。它明确要求人民“盲目地服从”，否则面临的的就是“安卡的愤怒”——监狱和杀戮（而监狱早已等同于杀戮）。安卡时时刻刻都在追捕“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和 KGB（苏联国家安全局）间谍”。安卡定义“敌人”的概念，他们是：旧时代的得利阶级（尤其是富裕程度普遍超过柬人的华侨），僧侣和越南人。安卡指出“敌人就在大众之中，就是那些不适应集体的人，4.17 份子（旧政权下的城市民众），还有病人”。安卡定义“隐藏的敌人”就是那些“党内的敌人”，“戴着面具的敌人”，“抱怨的人”，他们的出路只有一条——死！死！死！……。

安卡还提出许多劳动口号，例如：

“战斗的，勇猛的劳动者们，努力劳动！”

“努力劳动，多产稻谷！”

“稻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产量必须增加三倍！”

“大自然必须被战胜！”……

安卡要求“个体必须瓦解，集体遵照波尔布特”。安卡规定“革命庆典”的仪程，管理男女的婚配，组织新家庭，维护新秩序，取消个人财产，消灭一切商业，禁止社会交往，严禁个人自由，安卡还负责“锻炼新人”……。

除了冷酷，安卡倒也有一些能令你发笑的噱头。比如“柬共是第一个成立仅仅 15 年就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柬埔寨是全世界第一个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柬埔寨是第一个消灭了阶级进入了共产主义的国家”；“柬埔寨人既然能造出吴哥就能办到一切”；“红色高棉是共产国际社会的领导者”……令人无法不想起我们自己的关于“解放三分之二”的冷笑话。

你在《波尔布特小红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他自己的东西，要是放在一个法治国家，只要原作者主张，几乎任何一个知识产权法庭都可以依《版权法》起诉波尔布特或安卡剽窃。但就是这些完全抄袭的东西却是波尔布特政权所谓革命理论的全部。研究波尔布特的西方学者也感到奇怪，在所有共产党国家中，柬共是最极端的以党的教导和宣传做为基本元素来控制社会的，从 1975 年 4 月 7 日上台执政到 1979 年 1 月 7 日崩溃，45 个月内他们每天都在开会、学习、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刷品。这与留下大量的文字印刷品的中苏革命家们相比显得非常另类，也许越激进的革命越不需要文字吧。

《波尔布特小红书》的作者对安卡有一个很冷静也很冷酷的断语——“安卡起源于猿的社会（The Angkar Origin—ated from the society of apes）”。他认为从本质意义上讲波尔布特主义是要把高棉民族跳跃式引向“新的社会”——回到世界的原型。安卡在许多方面企图使人性回到原始的野蛮（back to the dawn of humanity）。45 个月的时间内这个政党攫住他的人民的全部心智和灵魂，剥夺了他们做为人类的全部快乐。

这就是波尔布特的革命——从人到猿的革命。

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这个发生在当代，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的而发生的巨大罪行，几乎可以断定是一个人类行为的先例。如果一定要觅一近似的例子，大概只能用中国上世纪中期那次“大跃进”来媲美。造成过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所谓“大跃进”，至今也没有任何对其正式否定的官方文件出现。这种以强行实现个人重构社会的政治抱负为目的而大批屠杀、虐杀同类，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应该属于那种“被快乐所压倒，被冲动所驱使，更加放纵也更加怯懦”的罪愆。

CGP 是一个令人欣慰的 Sign（符号），有顶尖的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历史学者在研究这一次极端的反人类行为，这是柬埔寨之幸，是亚洲之幸，更是人类之幸。和 CGP 的理念相反，有些人建议忘却，至少在自己存活的时代不要去触动这些巨大的伤疤，更不要去探究其因果链。作为红色高棉反人类罪的最大嫌犯之一，红色高棉的第二号人物乔森潘多次呼吁柬埔寨以及国际社会忘却这一段历史。他的呼吁换来的是羞辱——在一次国际法庭的审判庭外，由于庭警的疏忽他被打得头破血流。西方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的研究是对人性、人权和人道最好的尊重。


在大屠杀中被害的西方人不足 100 人，而死于这场浩劫的华侨则至少有 30 万，更令人悲哀的是，安卡屠杀华侨毫不避讳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为中国驻柬大使馆工作的华侨翻译和工人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常常是当着大使和大使馆官员就干这种伤天害理之事，后者还要帮着清理现场。

在国际社会中，仅仅屠侨本身就是万难被侨民祖国容忍的，这也是越南 1978 年底出兵柬埔寨的最直接的理由。但让人深感不解的是，作为柬埔寨最大的邻国，作为 30 万侨民的祖国，作为对屠侨负有直接历史责任的大国，作为对波尔布特大屠杀拥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发言权的当事国，中国 30 年来却不发一言。尤其令人不解的是 1979 年的对越战争，其起因到底是因为越南对中国边民的骚扰还是因为越南对红色高棉的打击触犯了中共？国人至今都被告知为前者，而国际上对这一小型战争的研究结果却大多相反。

在我看过的所有有关波尔布特大屠杀的文献和著作中，中国都占据了最为重要和关键

的位置。如果说波尔布特革命的启蒙老师是法国人的话，那么他的毕业导师或终身导师毫无疑问是中国人。到了波尔布特的时代，法国早已变为最反对暴力，战争和革命的国家，而中国还正在革命的兴头上，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老人家的革命瘾远远没有过够，因此当他听到波尔布特的“壮举”时，连声称赞他“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弄得小波更加颠三倒四，回到金边就做了 5 个小时关于《党的肌体已经生病》的杀人宣言，紧接着金边大迁徙的血雨腥风，一轮又一轮的大屠杀就没有间断过。而中国直到 1988 年还邀请这位杀人狂魔到访，他在四川青城山坐着滑竿优哉游哉的照片赫然出现在各种报刊上。

柬埔寨三朝元老洪森曾明确指出“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中国曾经是一个革命的输入国，也是一个输出国。1949 年中共执政后一共打了四场小型战争：1950 年的抗美援朝、1962 年的中印边界、1969 年的珍宝岛争夺、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四场战争均由中国挑起，都是为了输出毛的“革命外交路线”。四场战争全部打错，都对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对外关系产生长期不利的影响。中共掐断这条“革命进出口通道”是明智的。但中国对柬共提供的大量军事、政治、经济援助，以及从波尔布特执政后直至他死去的 1998 年期间中国的所作所为，至今还作为绝密而不让世人所知，则是不明智的。美国人做 CGP 研究，不排除有对自己 30 年前越战期间对越，柬外交政策错误作反省的原因。中国与其让不准确的消息由不正规的渠道传入，不如正视前辈们所犯下的罪愆，用自己的手来斩断罪恶的因果链，为子孙带来福祉。

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大屠杀的研究，除了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外更有人类学的意义。这个课题的研究应该是世界性的，至少应该是东方性的。

作者说明：本文上篇发表在《炎黄春秋》2008 年 4 月号上。本文下篇是翌年我在美国查阅到更多的资料，并与在美的柬埔寨华侨幸存者交流后完成的。竣稿后，交给最敢言的《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先 生发电邮给我：“王先生，您的资料太翔实了，我们要保护自己。”直到 7 年后，香港《明报月刊》2016 年 11 月号以《再探波尔布特大屠杀的教训》题目刊登，才让此文有了一个完整的文本。

【资 料】

一份无法回避的时间表

——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

蓝海鸥

“中共领导人在柬埔寨犯罪”。此话出自柬埔寨三朝元老、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之口，地点在金边联合国与柬埔寨王国政府组建的“审判红色高棉反人类罪特别法庭”，时间是 2007 年 11 月——红色高棉政权崩溃 28 年后，特别法庭终于开庭、被告以“Genocide”（灭族屠杀）罪被起诉之日。

“Genocide”，这个英文单词在这里显得软弱和不确——红色高棉大屠杀从未以种族的名义而始终是以“共产主义”之名进行。法国一位学者改称为“Autogenocide”——自我灭绝式屠杀，至少在词义上贴近事实。为方便起见，本文以下全部不使用中文“灭族屠杀”而使用“反人类”。

再现那段血腥历史对柬埔寨人是十分痛苦的，但这场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审判实在不能再耽搁了，必须与时间赛跑才赶得上耄耋之年的被审判者们奔往坟墓的速度，直到笔者下笔本文的 2018 年 11 月 7 日，他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为当年的罪行受到惩罚。波尔布特死于 1998 年，所谓“投诚”的英萨利、乔森潘等人至今仍然不受惩罚地生活在柬埔寨，还有许多当年的凶手，大多数已经垂垂老矣，有些已经自然入土，但他们获得了大赦，自由地活着。如果继续推迟审判，很多重要疑犯和凶手将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死亡，将很难保证同样性质的群体灭绝事件不再发生，天理也难容。

审判的艰难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红色高棉当年同时受到美、中两国的支持，两者先后都有过与越南为敌的经历。红色高棉从萌芽、崛起、猖獗直至崩溃之后多年，都笼罩在中国身影之下；而在 1980 年代，已经崩溃、流亡在密林间的红色高棉竟然作为合法的柬埔寨政府得到了美国的承认并获联合国席位。恐惧、仇恨、尴尬、难堪……五味杂陈的

人们出于各种目的急于忘记过去。力主以忘却和沉默取代审判的乔森潘，被法庭外受难者的亲友打得头破血流。比起势如破竹的东京和纽伦堡审判，美国的怠惰显而易见。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竟至不肯拿出一分钱支持这个国际特别法庭，更遑论将手中掌握的大量、直接、原始的波尔布特政权档案、文献、文件和记录呈堂或解密。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曾说：“许多人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种耸人听闻的惨事——集中营、残酷暴行、集体灭绝、大屠杀等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它们还是一再发生了，在柬埔寨、波黑、卢旺达。‘Genocide’是一个已经进入我们时代的词汇，面对这个可怕现实，我们必须作出历史性的回应”。但这个回应来得太艰难，虽有堆积成山的尸骨、档案、资料为证，认证物证俱全，但审判一直被柬埔寨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国际组织间难以厘清的关系所阻滞。正如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何塞·阿亚拉·拉索所说：“杀害 10 万人的要面对审判的机会，还不如杀害一人的人”。

国际审判触动了各参与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

1990 年代，联合国启动了追究红色高棉战争罪行的努力，其间风波不断。联合国与柬埔寨之间的谈判几经关闭和重启，双方对是否接受国际标准、法庭公正性如何确保来回拉锯。那之后又长时间为如何募集支持法庭运作的至少 5600 万美元经费而纠结。到正式开庭之日，最应被审判的红色高棉一号人物——波尔布特已经死去 10 年不止了。

发生在 1970 年代的红色高棉大屠杀，“罪魁”无疑是波尔布特，“祸首”却有个明确的指向——中国人。先来看一份不寻常的时间表：

1952 年 7 月，波尔布特留学法国、学习革命归来，加入丛林抗法武装。10 月，波氏秘密潜入中国南方某地，参加军政训练速成班。

1953 年 1 月，在训练基地波氏加入由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

1954 年 7 月 21 日，《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日内瓦协议）签订，越南退出柬埔寨，柬埔寨革命独立，波氏进入革命运动组织高层。

1955 年中，波氏再次进入中国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柬埔寨筹建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

1957年，开始起草《党纲》、《党章》，翌年就绪。

1960年9月30日，“高棉劳动者党”成立，波氏为第三号核心，其他两位是杜萨木、农谢。

1962年，杜萨木被政府军杀死，波氏当选总书记。

1963年，西哈努克政府开始通缉波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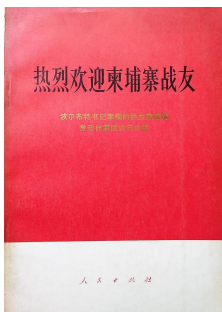
1965年，波氏步行穿过老挝到达河内，以柬共总书记身份接受越共传授建党、建国理论。11月，波氏不顾越共阻拦再次到访中国并做数月逗留，受到刘少奇、邓小平接见，住在颐和园附近“亚非拉培训中心”，具体与彭真会谈。彭赞扬布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波回赞“毛泽东思想是当代的马列主义”。此行波与陈伯达、张春桥接触，二位革命家给他讲述了中国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特别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和经验。此刻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激烈酝酿，即将爆发。波氏在北京一直逗留到次年2月。

1966年中，波氏再次潜入北京，觐见康生，亲聆康氏传授“铲除内奸”理论，极为钦佩和赞赏。本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更名为“柬埔寨共产党”，民众称“赤柬”或“红色高棉”。中国文革开始。

1966-1970年，波氏频繁进入中国，长期滞留北京，大部分是秘密的，少部分被中国公开报导。

1970年3月18日，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国王诺伦敦·西哈努克被废黜。正在河内深造的波氏随越总理范文同来华，但未露面。柬共决定停止攻击先前视为敌人的西哈努克并与之联合打击朗诺，柬左派势力集合到西哈努克旗帜下，柬共领导人也成为柬第一届王民族团结政府的内阁成员。6月，美国宣布撤出入侵柬埔寨的军队，实施“战争高棉化”。以柬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集中打击朗诺集团。5月20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毛泽东《五·二〇声明》，掀起援越高潮。

1970-1974年，波氏来到北京“学习”、“取经”已成常态，中国报纸上个人崇拜式赞扬文章极多。



1974年2月，《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闻纪录电影厂记者组团从河内沿“胡志明小道”、经老挝进入柬埔寨，在战乱中访问“红色高棉解放区”。这是“红色高棉”接待的第一个外国新闻代表团，也是波尔布特、乔森潘、宋成、英萨利会见的第一批外国记者。代表团拍摄了电影纪录片和一批战地照片，还写了一本小书在中国公开发行。

4月28日，发生橘井事件：大批红色高棉武装分子开进桔井市，把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地，并拘捕100多名想回中国的华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事发时中国大使馆经不允许华人躲入避难，事后毫无反应。

1975年3月29日，美军从越南撤退，4月郎若逃亡国外，红色高棉占领金边，17日开始惨绝人寰的金边大迁徙，同时开始对华侨的大肆屠杀。6月21日，波氏秘密访华，与西哈努克、英萨利等一起受到毛泽东接见。毛说“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只有赞成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毛口中波尔布特的“好经验”，至少可明确得知两点，1. 波氏对政治敌手的“肉体消灭”胜过中国让他们“苟延残喘”；2. 仅仅2个月前惨绝人寰的金边大迁徙之“革命的彻底性”远胜过中国的“上山下乡”——波尔布特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自此，柬埔寨随处可见“胜过列宁，超过毛泽东”的标语口号，《安卡如是说》



一书中就有。在中国援助下开始发行红色高棉货币。10月波氏公开访华，周恩来亲迎；

1976年1月，柬埔寨正式更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2日西哈努克宣布退休，6日宾努率全体政府阁员辞职。14日乔森潘、农谢、波尔布特分别出任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和总理。两天后毛泽东亲自致电祝贺。7月，波氏接见中国首任驻民柬大使王幼平。9月，红色高棉举行吊唁毛泽东大会。

1977 年，红色高棉取消货币，提出“超大跃进”、“超千里马”的荒唐口号和举措，死人无数，同时开始党内“大清洗”。9 月 28 日，波氏访华，北京组织 10 万群众（大多数为在校少儿）欢迎。邓小平、李先念亲迎，华国锋接见。汪东兴陪同参观毛泽东遗体，乌兰夫陪同访问南京、无锡、嘉定、上海，邓颖超到宾馆看望，徐向前、王震、叶剑英陪同游园，陈慕华陪同参观工厂，陈永贵陪同参观大寨，叶剑英陪同看体育表演，邓小平饯行，乌兰夫、彭冲欢送去访朝鲜。

1978 年 1 月 3 日，苏越签订《合作条约》。邓颖超访问暹粒、金边。4 月，波氏在柬共成立 17 周年大会上报告的中译本出版。5 月波氏与齐奥塞斯库签订柬罗友好合作条约，8 月会见土耳其记者，揭露越南野心，9 月会见法共总书记儒尔盖，盛宴庆祝柬共成立 18 周年，宴请日共代表团，会见美国记者和德共代表团，接见日本新任驻柬大使。以上活动均由中方出资。11 月汪东兴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柬。12 月越军大举进攻红色高棉，圣诞节发起总攻。

1979 年 1 月 7 日，越军占领金边。红色高棉望风而逃，溃退前为不留活口大肆屠杀 S21 监狱囚犯。中国驻柬大使孙浩随波尔布特部队向泰柬边界梅莱山区溃退。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站在以波尔布特为首的民柬政府一边，竭尽全力给柬埔寨人民多方面支持”。2 月 17 日，中越战争爆发，历时 27 天。指挥官：中方——徐向前、许世友、杨得志，越方——黎笋、武元甲。双方数据：中方参战 20 万正规军，死伤 2.7 万。越方参战 10 万正规军、15 万民兵，死伤 11 万。双方宣告胜利，实际两败俱伤；

1981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拒不承认中国对波尔布特政权的支持是不人道的。

1982 年 6 月，乔森潘、西哈努克与宋双组成联合政府抗越，得到中国大力支持——政治上助其维持联合国席位，物质上提供大量武器与战争物资。根据德国专攻中国外援问题的著名学者沃尔夫冈·巴克特（Wolfgang Barkte）的研究数据，到该年为止中国对红色高棉的援助才开始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1984 年 4 月，中越老山战役、两山（法卡山、者阴山）轮战、西沙战役，造成难民无数，出师之名是“锻炼部队”。10 月 1 日西哈努克、乔森潘、宋双参加中国国庆阅兵式。美国人拍摄的电影《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s）公映，震撼西方世界。

1985 年 1 月 1 日，乔石宣布停止一切对东南亚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援。波尔布特与不足 30 岁的“密松”同志新婚；6 月波氏访华，胡耀邦宴请。



1980-1990 年代，波氏常驻中国修养，1988 年在四川青城山坐滑竿游山照片刊登在各大报刊上，但其共产活动情况不明。1988 年 6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驳斥美国《华盛顿邮报》“中国同意波尔布特在中国避难”报道毫无根据。虽然“避难”问题无法回避，但中国-红色高棉关

系趋冷是无疑的。

1997 年 6 月，垂死的波氏以间谍罪下令处死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妻子云雅及全家妇孺 11 口，并用卡车碾碎尸体。此举激起众怒，总司令塔莫克逮捕了波尔布特。7 月 25 日，红色高棉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波氏因“背叛民族”、“杀害同志”被判终身监禁。




1998 年，波氏死亡。

2003 年 6 月，联合国与柬埔寨王国政府签订成立“柬埔寨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简称 ECCC”协议。大审判工作量极为庞大，预算为 5300

万美元，联合国诸成员国均有出资，如澳大利亚 140 万美元，挪威 100 万、日本、新西兰等都在 100 万以上。中国始终拒绝出资。

2006 年 7 月 3 日，ECCC 正式开庭。

到此文杀青的 2018 年 11 月 16 日，ECCC 才首次判决农谢和乔森潘犯有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

联合国秘书长协助红色高棉审判的特别专家大卫·谢弗（曾任美国战争罪行问题巡回大使）对媒体这样说——“此次审判的重要性与纽伦堡审判一样”。

【资 料】

2005 年在“柬埔寨有计划灭绝屠杀”

专题研究组成立时的讲话

本·基尔南¹、里奇·里克²

很高兴站在这里，谢谢耶鲁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和耶鲁大学图书馆给我这个机会，讲述关于高棉历史和它的最近发生的事情。然后里奇·里克将跟进图书馆的这一研究课题。

自从 15 世纪高棉王朝创建了吴哥窟后即迁徙到湄公河下游，这个国家至少已经有过 6 个首都。每一次迁徙都会遗失大批文献史料。加上 16 世纪（本·基尔南/Ben Kiernan）来自菲律宾、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侵略，征服者闯入高棉烧杀掳掠，造成更严重的损失。在战祸的空隙中，国家籍着贸易而变化发展，但是文件、文献的遗失无法弥补。吴哥时代的文字从棕榈叶记事开始，但我们今天只限于从幸存的石头镌刻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小棍棒计数是从中古时期开始的，文字就非常难得了。19-20 世纪，金边已经是高棉国的首都。经过了 6 次政权的更替，1945 年获得独立。但她并未与世界有过紧密接触并经常发生政治上的骚动，这些骚动往往导致文件记录被毁灭。

我在 1975 年初第一次拜访高棉。数月前红色高棉刚刚接管了政权。我遇到一个美国人，他在高棉市场中买到一只被裹在纸中的鸭子。打开包鸭子的纸，赫然发现一纸艾森豪总统写给西哈努克亲王的信。

红色高棉接管政权后，他们不只疏散了城市居民，也切断这个国家一切与外部文明沟

¹ 本·基尔南是耶鲁大学“A·Whitney·Griswold 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历史学教授。他是耶鲁大学“柬埔寨有计划的灭绝屠杀”研究课题的创建和指导者。项目网址是 www.yale.edu/gsp。2000-2002 年，他担任了耶鲁东帝汶项目的召集人。1983 年，他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获东亚历史学博士学位。著述甚多，包括《波尔布特的上台、柬埔寨的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 1930-1975》（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4）；《波尔布特政权：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的种族、权力和种族灭绝 1975-1979》（耶鲁，1996）以及其他关于东南亚种族灭绝历史的著作。他是一个重要的“亚洲研究编辑委员会”成员，“人权审查委员会”成员和《人权、种族灭绝研究期刊》的主编。他编辑的丛书《柬埔寨的冲突与变化》获 2002 年亚洲研究大奖。目前他正在为耶鲁大学撰写自 1450 年以降的全球种族灭绝史。他的本科课程包括东南亚 1900 年始的历史，越南早期史、越南战争、东南亚环境史、越战与柬埔寨种族灭绝的关系等，是一位优秀和多产的学者。

² 里奇·里克是耶鲁大学图书馆东南亚和南亚研究馆长。在耶鲁大学期间他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发掘、组织、安排和保存关于柬埔寨大屠杀的档案材料。

通的渠道，他们驱逐新闻记者，关闭学校和大部份医院，废止所有的报纸和邮政服务。有四年之久，这个国家极少有书面沟通。从外部看来，这个国家不可能有纸上的任何记录，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记录那些在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发生的事情。这种状态从 1975 年初持续到他们 1979 年被推翻。

1979 年 1 月，当越南人从泰国边界进入柬埔寨并击败红色高棉的时候，他们清楚地懂得，如果想要了解 4 年中所发生的一切，只能依靠难民与生还者大量的、集中的口述。这个工作都是由对高棉历史和刚刚发生的有计划的灭绝屠杀感兴趣的学者完成的，他们大量与生还者面谈并做详细记录。那时我们谁也不指望会有任何书面的文字记录。我记得 1979 年 5 月，我在伦敦的《伦敦卫报》上看到一名记者的文章，声称能够利用红色高棉时期的监狱记录提供迫害和处决囚犯的细节。但我怀疑此类文件根本就不存在，我真的不相信红色高棉是那种会留下大批书面记录的政权。

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他们竭力销毁这些记录。至今外部世界甚至大多数高棉人都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当他们在 1979 年一月撤离城市时，波尔布特和农谢命令监狱长康克由焚毁监狱的所有记录，可是在越南人到达监狱之前的两个小时中，他没有去做上级命令他做的工作而是临时改变了主意——去杀死那些还活着的囚犯。所以越军到达监狱后发现了有时间排序的 10 万页文件——囚犯的拷问和他们被迫认罪的日常记录。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康奈尔大学开始了一个缩影胶片计划，来整理和记录这些监狱数据。

在另外的一所乡下监狱——事实上还有很多这样的监狱，但只有一个被保存了下来。当我到达那所监狱时，当地村民告诉我大部份文件都被卷成香烟吸掉了，但还是有很多文件幸存，而且被复制了下来。我不认为红色高棉会希望他们的文件出现在互联网上。当第一条监狱记录出现在新闻媒体上时，窝藏在泰柬边界的波尔布特政权第二号人物农谢大发雷霆，怒骂管理监狱的人是白痴，质问他为什么不焚毁那些文件。在这些文件面前，红色高棉不可能否认他们曾经做过的事情。

1994 年“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有计划的灭绝屠杀”研究项目在耶鲁大学建立，它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整理这些记录。虽然我们得到了柬埔寨政府的授权和美国国务院的赞助，

以寻找更多的文件，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将计划仅限于这两个监狱的记录，我们真的并不指望能找到更多。我们的焦点是将已经发现的文件集合并编成索引目录，其次是启动一个影视计划，横跨柬埔寨追踪那些屠杀现场的“万人坑”和监狱的遗址。我们与新南威尔斯大学图书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合作这个项目，特别是微缩胶片项目的档案，通过耶鲁大学图书馆 GIS 地图部分和网络上的资料，我们认为都能找到。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收集到了大量档案。从 1979 年起到 1996 年止，这些档案居然一直没有被发现。它们大约 10 万页，其中有很多是手写的，有些文件上还有波尔布特的手写签名。这是红色高棉的秘密警察文件，不仅仅是中央监狱记录，而是对波尔布特高层的报告。其中有一份囚犯名单，还有一份某人供认他的家人和联系人的名单，波尔布特本人在旁边潦草地批示“跟踪”，换句话说也就是逮捕名单上所有的人。这是一个无意中的巨大发现，它包括全柬埔寨红色高棉监狱系统的 Santebal 档案（Stantebal 为红色高棉术语的英语音译，意为“安全警察”，是专门负责逮捕、监狱、刑讯和死刑的特殊部门）。高度证实了红色高棉高层和波尔布特本人所犯下的罪行。下面由里奇·里克讲讲缩影胶片计划。

1998 年，本·基尔南教授在图书馆和我们讨论保存这些红色高棉 Santibal (S-21) 档案的可能性，这是个非常棒的主意。但我自己在文件保护专业上经验不多，因此我和本的助手、身在柬埔寨的文件中心主任育克·唐和还有保罗·康威一起坐下来研究和讨论，如何把这些 Santibal 文件集中起来并将其从柬埔寨带出来。

我们最担心的是柬埔寨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柬方不愿意看到这批文件在外界被公开，而情愿由自己的学者来解密。他们会不会同意内外双方的合作是不能确定的，即使是被外国人拿到文件的副本，并防备原件被拿到金边以外。

本来，我们的中心思想是尽可能地扫描它们，可是 10 万页实在是太多了，进度会十分缓慢。而且那边没有如此巨大的文件处理能力的计算机去存储和传输，我们需要找到更好和更快的办法。保罗·康威建议我们先打道回府，作一个缩影胶片的计划。

我对建立一个缩影胶片计划没有经验。我们提出了一个总预算案，保罗提供借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的手提式缩影胶片照相机，他很快地训练我如何操作和维修、替换零件。

我们知道柬埔寨的电压和频率都与美国不同，所以还需要一个靠得住的电压电流转换器。

图书馆非常慷慨地为这个计划提供了资金，但是不够，还需要向东亚研究协会提出帮助的请求来完成计划。1998 年春，我为亚洲研究年会去了协会，我说服他们并且成功了。

这年 5 月，我小心翼翼地在泡沫外套中放置这台老旧的照相机，试着尽量把它包装得小一些，以便航空公司准许我把它带上飞机。我把它包在怀里一直抱到金边。我从未去过金边，而且这是柬埔寨的第一台缩影胶片处理机器。我们的计划是最好的主意——把那些文件摄入电影，再放入一个 DHL 盒子里运回美国，而我们继续呆在这里，处理胶片因为任何照明缺陷留下的阴影，修饰和重拍。我们无法高质量控制焦点，但当它们运到美国后，我们能做后续的很好处理。

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我们决定扩张计划。本来计划两年完成的这项工作提前完成了，我们何不继续收集其他有价值资料来做成一部微电影？我们说做就做，收集到许多红色高棉暴行受害者的请愿书以及他们幸存下来的家庭成员的采访记录，还有 1975 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府与红色高棉军队之间的关系以及交易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制作了一部微型胶片电影——《Renoxe Collection》。然后我们决定继续前进，把收集到的大约 385 本笔记本，都是监狱的狱卒们所写，做成最后一个微缩胶片集，它们包含了狱卒们记录的会议、自己写的诗、医务训练、军队训练数据和各种他们执勤时认为有趣的事情。

这个项目花了很长的时间。当技术问题出现时，我们不得不重新来过。我们不得不与柬埔寨的微缩胶片相机操作人员沟通，大量地重新拍摄。灯光也有问题。有时他们的拇指就插在文件中间而不自知——他花了一个月把电影拍好送给我们处理，可是我们不得不告诉他“哎呀，在 43 号卷 367 号文件中有你的拇指！请重拍那一份文件”。他们非常勤奋，记录了每一份文件的来龙去脉，所以他们能够再拍摄它一次。现在，大约六年之后，我们已经最后完成了项目。电影的正本在耶鲁，研究图书馆中心有一个副本，康奈尔也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个副本给柬埔寨文件中心，以便那里的研究员可以使用电影而非原始文件进行研究。



【资 料】

设立“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国家纪念日”的政府令

白宫 2017 年 11 月 7 日



今天，我们的国家设立“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日”，用以纪念 100 年前发生在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给人类带来了数十年的黑暗。共产主义是一种和自由、繁荣与人类生命尊严绝不相容的政治哲学。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世界有超过 1 亿的人被极权的共产主义政权杀害，至今还有无数的人们遭受着它的暴力和剥削，灾难无法历数。共产主义打着“解放”的幌子，有系统地剥夺无辜人民的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其他无数在我国人民的眼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渴望自由的公民被共产主义的国家机器通过暴力、恐惧和胁迫而征服。

今天，我们缅怀所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已经死去和还在继续遭受苦难的人们。为纪念全世界为自由而勇敢战斗过的人们，为纪念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我们将在每年的这一天庄严重申美利坚合众国的决心——誓让光明与自由普照全人类。🇺🇸

（白宫的官网，whiterhouse.gov 11/7/2017）

【资 料】

“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 总统宣言

白宫 2017 年 11 月 7 日



在“全国纪念共产主义受害者日”这一天，我们要铭记百年来超过一亿的被共产主义极权政权杀害和迫害的人们。我们重申，坚定支持那些为世界和平、繁荣与自由而奋斗的人们。

自从 1917 年俄罗斯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我国人民目睹了共产主义专制意识形态制造出来的各种痛苦、压迫和死亡。共产主义将天赋的人权置于所

谓“所有人的福祉”之上，彻底剥夺了个人的信仰自由、私有财产和言论自由，将他们的生活无情地毁灭。

这些恐怖事件包括在乌克兰故意制造人为的大饥荒，在俄罗斯进行恐怖的大清洗，在柬埔寨大肆屠杀国民并建立专于屠戮的“杀人场”，在柏林墙下枪杀试图逃向自由的人们……。这些暴行以及许许多多发生在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其他暴行，都无言地证实——共产主义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企图，都是对人类精神和人类繁荣的永久性毁灭。

今天，我们缅怀所有在共产主义铁蹄下被剥夺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力的人们，让我们在每年的这一天一起哀悼如此众多的他们，一起体会他们所蒙受的巨大痛苦和损失，并重申美利坚合众国对所有追求自由的人们的庄严承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帮助你们。

（白宫的官网，whiterhouse.gov，11/7/2017）

【评 论】

Killing Field-共产主义屠宰场

铁 镒（北京某中学历史教师）

2002 年，我参加了一个东南亚旅行团，其中的一站是拥有被称作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哥特式建筑——吴哥窟的美丽国家柬埔寨。行前，我在权威旅游丛书《孤独星球 柬埔寨》上发现了一处奇特的“景点”，就在柬国首都金边附近，名叫“钟屋杀人场（Choeung EK Killing Fields）”，不在任何中方旅行社安排的行程中。但越是不让去的地方反而越能激起游客的好奇心，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在结束了大小吴哥窟的游览后，一到金边，我就向柬方地陪提出要去参观，他们的回答也很简单：只要愿意费用另加，可以安排。我们是个七人小团，都是教师，在我的鼓动下，大家一致同意前去。

仅仅另付了一点美金我们就成行了。“景点”本身是不要钱的，但双方旅行社都坚决不肯提供陪同，更别提讲解了。原因我们后来才知道，不是不安全或成本高，而是此“景点”根本无法讲解、无法解释，甚至无法开口说点什么，尤其是对中国人。可正是这个无推荐、无陪同、无讲解、不要钱的景点，给我们七人留下了永生永世也不能磨灭的印象。

“杀人场”所在地名钟屋，距离金边 12 公里，我们一行坐一辆八座电动车，往返才收费 12 美元，司机愿意在原地等候我们，原因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几乎没有一位游客会在此“流连忘返”，人们常常是慌不择路地“逃离”这里，肯定不会让司机久等。

我们得知钟屋原本是一片美丽静谧的荔枝林，如今却成了闻名于世的屠宰场遗址，但屠宰的对象不是牲畜，而是人，和你我一样的人。

从 1975 年 4 月 17 日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政权上台执政，到 1979 年 1 月 7 日被越南军队赶出金边，在红色高棉执政的 3 年 8 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一天都在杀人，大批大批地杀！杀！！杀！！！不分妇孺老幼，无论有害无害。杀人在柬埔寨已成工作、职业和游戏。

波氏屠杀的恐怖程度闻所未闻，仅密集度一项就超过了蒙古铁木真汗著名的“环球屠杀”。为了配合杀人和处理尸体的速度，波尔布特政权专门在金边近郊开辟了这个“杀人场”，杀人是流水线式的、程序化和职业化的，这比战场上的杀戮和一般刑场上的屠杀恐怖了无数倍。

展示厅旁边是“Truck Stop”，标牌上英文说明是：“这里是卡车停车站。这些卡车每月或每三周到达 2-3 次，每辆卡车装有 20-30 名惊恐的、被蒙上双眼并沉默不语的囚犯。当卡车到达时，受害者被直接带到沟渠或深坑处决，或者暂时关进附近黑暗的囚室（但我们已从展示厅得知，这里无人生还，所以后来连囚室也不需要了）。到1979 年 1 月 7 日（注：越南军队攻陷金边的日子，后被柬埔寨王国政府定为全国性纪念日——“大屠杀逾越日”）还有一辆执行这种任务的卡车停在这里”。

“卡车站”旁边是“The Executioners Working Office”（刽子手办公室）。这里是刽子手工作的地方。办公室和杀戮场都配备了照明电，以便这些职业杀人者能在夜间阅读和签署被执行者名单，以及顺利地执行死刑。



再隔壁，是“The Chemical Substances Storage Room”（化学物品储藏室）。由于杀人过于密集，尸体处理是件很棘手的事情。群葬坑到处都是，但泥土很难遮盖住刺鼻的尸臭。柬埔寨是个热带国家，雨季很长，尸坑被冲开是常事，那种恶臭是连职业刽子手也受不了的。化学物品储藏室存放着大量 DDT 等化学物质，以便于行刑者在杀人后将它们撒在被杀害者的尸体上。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避免尸体发出恶臭引起怀疑，二是直接撒在被活埋处死的人们身上，窒息他们死亡前发出的惨叫。

这些标牌的英文说明已足以把人的心脏紧紧扼住，可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转过身来，劈面是一座蓝黄相间的美丽高塔。我们已经知道将会在那里看到什么，女士们踟蹰着不敢前行。但我们还是来了。

高塔正面镶嵌着一块白色的石碑，上面镌刻着 “Would you please kindly show your respect to many million people who were killed under the Genocidal Pol. Pot Regime.”

（请静静地向数百万被波尔布特政权杀害的人们表示你的敬意）。转过去，就是成排成列



的人类头骨，大小不一，无比狰狞的骷髅，无数双空洞的眼窝直直地逼视着你，令你无法闭上自己的眼睛。

钟屋杀人场是 1980 年代被挖掘的，当时挖出了近 9000 具尸体。最先挖出的这些尸骨头颅被放进了这座联合国援助建造的骨塔。塔共有数十层，层层叠叠放进了 8000 个骷髅。我们去的时候还有许多群葬坑尚未挖掘，因为实在没有地方来堆放那么多尸骨了。

你随处可见这样的标牌：

“Mass grave of 450 victims.”（450 名遇难者的集体墓葬）；

“Mass grave of 166 victims with cut heads.”（166 名被砍掉头颅的遇难者集体墓葬）；

“Mass grave of more than 100 victims children and women whose majority were hanged.”

（100 多名妇女和孩子的集体墓葬，她们多数是被吊死的）；

一些外国人也在这里被杀死了，其中有九名欧洲记者。路边一块标牌上的照片，是澳大利亚记者大卫·里奥·斯科特，他在这里被虐杀。

.....

刽子手为节省子弹，处决多用棍棒重击、刀斧砍杀、勒毙或绞杀（这倒是很像中国延安当年处死王实味的境况）。一棵大树旁立着这样的标牌：“Killing tree against which



executioners beat children.”（杀戮树，刽子手专门用于殴打和杀害儿童处）。

在一名操英语的游客指点下，我们居然在树干上发现了一些小小的牙齿。原来刽子手们是倒拎着孩子的双脚，将头对着大树“砰”的一声死命砸过去的。大树上嵌着的小小牙




齿就是他们的遗物！妇女则在被强暴后蒙上双眼，一丝不挂地遭重棍击毙。另一颗大树被标志为“Magic tree”

（魔鬼树），树杈上架着几支高音喇叭，当年整日整夜发出巨大的音响，都是红色高棉那些奇奇怪怪的歌曲和口号，其作用很简单，就是为了掩盖受害者濒死时的呻吟和惨叫。

三位女士实在是受不了了，捂着脸逃了出去。一位男士也呕吐着退出了，只剩下我们三人，坚持着看下去。

在一片凸凹不平的茵茵绿草坪上，矗立着“Unexcavated mass grave”（尚未挖掘的万人坑）标牌，草地上散落着褴褛的衣物。我心里像被一团棉花堵着透不过气来，本能地深呼吸一下，突然就闻到一股诡异的气味。天呐，分明是腐烂的死尸气味！虽然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直至今日这里居然还不绝地散发着地狱的恶臭！

从钟屋杀人场出来，坐上等待在路旁的电动车，没有人说话，一位女士在哭泣。我听不见周遭的任何声音，耳畔只有无数冤魂在炼狱里绝望的嘶吼。这些冤魂在今天连平反都没有任何意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全家灭门，都被杀绝了。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之下，在我的时代（2002 年的我还未满 40 岁），类人猿般的暴徒们以共产主义之名，以两百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一位暴君的所谓“伟大理想”！这位禽兽不如的暴君居然是我国伟大领导人的伟大朋友！如果通往所谓“共产主义天堂”之路都是由这样的污血、尸骨、粪土铺就，这样的天堂我要去吗？你要去吗？我们要去吗？

【评 论】

“中越边境反击战”的目的何在？¹

桑钟鸣

1979 年的中越战争，给交战双方带来的是十几万军民的伤亡，给一再声称“中国从未给任何国家带来任何伤害”的国家做出了最好的反证。中越战争是 1949 年后中国打的四场小型战争中最窝囊的一场，血肉横飞的战场被当成练兵场，年轻军人的生命被视如儿戏。

2017 年两会期间，两会发言人傅莹回答西方国家揪住不放的中国军费问题，针对美国“在南海的意图”暗贬一番后，声称中国主张通过谈判而不是战争解决周边问题，最后不经意却又多余地补充了一句：“中国从来没有给任何国家带来任何伤害”。

这句话是习惯性的公然撒谎。毛泽东时代输出暴力革命，从 1949 年起就向外推销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道路”，从理论到武器，要颠覆的就是周边国家。1960 年代更以“三斗一多”（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要斗，对各国革命斗争支持要多）对抗苏共的“三和一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别国革命干涉要少），提出推行暴力革命就是反修的核心。结果被当作试验田并派兵、派武器、派军代表的缅甸共产党最惨，最终溃败党魁自杀。印尼共产党更在中共蛊惑下发动政变夺权，一败涂地后 300 万党员死掉 1/7，并连累华侨无数。中国伤害周边国家，更恶劣的例证就是 1979 年的所谓“中越边境反击战”。当时全球数十个东西方国家都反对，只有两家表示支持——金日成的朝鲜和已经被越南人赶到泰柬边界大林莽的红色高棉。

这次战争的背景是：1961-1973 美国介入越战期间，中苏两国都曾支持北越。其间中苏分裂，越共倾向苏联。待到中共大力支助的柬埔寨红色高棉上台（1975-1978），党魁波尔布特实行毛氏暴政，将全国 600 万人杀掉了 1/3 时，越苏订立了友好合作条约。柬埔寨反波尔布特的韩桑林救国路线遂联合越南攻柬，1978 圣诞节推翻红色高棉政权，翌年 1

¹ 此文系作者对港台媒体刊发的相关报道的综述。

月 7 日攻下金边。中共不承认韩桑林新政权，并于 40 天后即发动了中越边境之战。

发动中越战争的真实动机究竟何在？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无数道趣迷中的一道。

这场战争被中国学者称为“围魏救赵”，显指攻打越南是为失败的红色高棉复仇。中越战争是不宣而战的，是中方对越方的突然袭击，并对国内宣传为“自卫反击战”，但美国国际关系专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中方对美国在 1979 年月 1 日与北京正式，与台湾断交并废约撤军的回报。所谓“中美关系正常化”就这样牺牲了两个小国的利益下实现了——台湾被孤立，越南被武力惩罚。北京官方对出兵的解释是“越南在边界挑衅、在国内排华”。2 月 17 日，30 万中国大军从东西两线攻入越境，逼近河内，遭河内守军强力反击，伤亡亦重，而后撤军。战争打了 28 天，将大部分援越设备捣毁、或运回。最后以中方伤亡 3 万人、越方伤亡 10 万人，中越边境十数年硝烟、冲突不断，两国从此结下怨仇而终。越南至今维持着世界第三大的陆军兵力，就是因为不敢懈怠地防备北敌来犯。这场战争发动者的三个真实动机是：

1. 不是为国家利益、边界或华侨争端，而是蓄意延续毛的暴力革命路线，以武力支持一个被全世界唾弃的残暴政权红色高棉；

2. 毛在“防修反修”旗号下，在国际上不断挑起事端。惩越之战是毛氏反修的继续；

3. 邓动用军权发动对越战争，声威飙升，接着成功将华国锋赶下台。

中越战争十年后，《血染的风采》这首歌颂侵越战的歌又成为六四牺牲者的安魂曲，那场肮脏的战争被遗忘了。今天，唱红这首歌的歌者又成了退伍老兵“维权”的领导者，40 年里这首歌幻化出巨大的讽刺意义。

1979 年 2 月 17 日，中方军队在 500 公里的战线上对越南发动了突袭。开战后，中军接连拿下越南数个省会，河内陷入混乱。3 月 5 日，中方发表撤军声明，越方则发布全国总动员令。3 月 16 日中方完成撤军行动，这场战争告一段落。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当时双方都没有公布数字。战争结束后叶剑英、李先念等有个内部讲话，谈到中方死亡 4.8 万人，越方死亡也是 4.8 万人，但中方全是年富力强的小伙子，越南则包括民兵（多为妇孺、

老人)。这场战争打得极为惨烈，越军抵抗的顽强度超出中方预期。有如下几个原因：

1. 中方仍然沿用朝鲜战争的“人海战术”冲击敌方的阵地，同历经战火洗礼的越南人相比大为逊色。文革期间部队光突出政治，很少军事训练，战士不会打仗，军官不会指挥，且缺乏山地、丛林战与夜间战斗的训练，装甲部队和步兵不能协同作战。一位当年亲历者告诉我，中方某营有一次遭遇越方 9 人游击队骚扰性伏击，300 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云南边境的一个乡长在 1982 年给我讲：战争开始，中方在炮火掩护下向越军阵地发起进攻，冲锋号一响士兵们往上冲，一个连一百多人，退下来只剩二三十人。再换一个连上去还是大部分牺牲。最后攻下山头，发现上面只有二十多个越军。乡长说，当时他组织民兵抬担架，满山坡都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惨极了。

2 中军采用机械化部队穿插包围，但忽略了越南北部全是山区及热带雨林，不利于装甲部队作战。越南装备的苏军以及缴获的美军反坦克武器很容易击毁中军坦克，有的坦克突击时步兵跟不上，损失很大，二百多辆坦克被击毁。


最愚蠢的做法是步兵随同装甲部队穿插包围时，为了避免从坦克上掉下来，用背包带把自己绑在坦克上，有的坦克上绑了二十几人，结果遇到伏击不能及时下车作战，成了人家刀俎下的鱼肉，有的士兵没有解开带子就被打死了。有的被击毁的坦克，上面绑着四五个被打死的步兵。此外，到处都是越军布下的地雷，中军排雷设备不足，战场紧急就用人体排雷，伤亡很大。同时，被自己部队炮兵误伤的情况时有发生，医务人员不够，救治不力，伤员死亡很多。

3 对越南人战斗意志估计不足，吃了很大亏，“战情通报”有详细报导。有的士兵把俘虏的越军士兵背下阵地，没想到越军士兵趁战士不注意，拉响了士兵身上挂着的手榴弹同归于尽。有的越军重伤员手被打断，士兵背他，他用牙咬掉士兵的耳朵。越军地方部队有很多女兵，被中方俘虏后，押送的战士放松警惕，结果被女兵夺下冲锋枪一下子打死七八名战士。后来上面下令，不抓俘虏，统统打死。越南是全民皆兵，“战情通报”有这样一个例子，中军大部队行进中突然有迫击炮弹落到队伍中。派队伍搜查，只见到地里有一

些越南妇女劳动，搜不到任何敌军。部队继续前进，结果又有炮弹落下来，伤亡很多。后来发现，这些妇女都是民兵，她们把迫击炮藏在地里的土坑里，上面用斗笠盖着，趁你不注意就开炮。你来搜查，她们再把武器藏起来，若无其事在劳动。后来上面下令，无论男女老幼，一概格杀勿论。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当时是团长，他回来后告诉我，中军因伤亡太大，杀红了眼，上面下令实行三光（杀光、烧光、抢光）焦土政策，非常残酷。“战情通报”也报道了类似情况。如越南的煤矿主要集中在谅山地区，许多是中国和苏联援建的，中军撤走时全部炸毁。老百姓的房屋全烧掉，鸡鸭猪牛等都打死吃了。打下城市后不但炸毁所有的房屋，连电线杆都炸掉，能搬走的设备包括铁路上的铁轨都拆回来了。越南山区天然溶洞极多，加上几十年构建的工事，几乎是洞连着洞，如同地宫。越军一旦抵抗不住，就化整为零钻入山洞，等中共大军过去后，再钻出来打游击，杀害中方后勤人员，造成后勤补给的极大困难。同时也很难找到越军指挥部。后来中军就把可能藏有越军的山洞全部炸毁。

此外，中军密度很大，几十万军队，分布在狭小的战区，唯一的几条道路挤满军队，为此互相还发生冲突。我的一位同学说，晚上宿营，周围山坡都是友军，这时越军会说汉语的特工混进来袭击，造成很大伤亡和混乱。有的部队指战员被打死后，新调来的指战员、战士互不相识，也很难指挥，由此产生的混乱状态也是中军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中方战争初期提出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中共的小兄弟红色高棉在越军的进攻下垮台了。问题是，中国士兵值得为这样的政权流血吗？越南战后更加疯狂排华，华裔官员被解职、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大批华人被驱逐，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死者不计其数。可即使是这样，与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政权在执政 3 年多的时间里，杀死 60 万华侨的一半——30 万人的罪行相比，不也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吗？

【文 摘】

毛泽东与世界革命

何 方

在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心目中，没有全人类概念。他们只承认作为阶级的人，硬说人类必按阶级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部分人类的关系又只能是你死我活，你负我胜。捷尔任斯基 1918 年 9 月 3 日干脆说，阶级敌人不是人，是毒蛇，苏联意识形态包括消灭阶级敌人。毛泽东在 1943 年 12 月 17 日给刘少奇致续范亭信加的批语中有两段话：“‘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实现”；“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可见，这三位革命领袖要完成的解放全人类事业，就是要由被划为无产阶级的这部分人类通过暴力和专政，消灭或打压被划为资产阶级的那部分人类，使他们即使不是失去生命也得俯首听命于无产阶级。划分阶级的标准没个准，因人因事而定。对独裁领袖的态度是头一条。被划为无产阶级人类的，可以无法无天，随意去共被划为资产阶级人类的产，去公然剥夺他们的各种自由。资产阶级人类只能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后者在我国，就是各类“分子”和知识分子群体。在红色高棉，就是被波尔布特纳入“新人”的有产者、有知识者和城市居民（其中包括大多数在柬华侨），他们的命运是被杀（总数以百万计）、被关和做苦工。

把人类“按阶级”划为两类，而且强调无产阶级人类必须仇视和鄙视资产阶级人类。这种学说代表和推动的只能是人类的野蛮化。因为评判人类先进和落后、野蛮和文明的标准，毕竟只能看人们脱离假恶丑野蛮人、靠近真善美文明人的程度高低。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三位革命领袖这些想法和做法，属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过的“粗陋共产主义”。马克思说，这种共产主义是反动的，其实并不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还批判过中国和印度小农经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主义，说这只是“东方式的专制”和小市民式平均主义的愚蠢和嫉妒。恩格斯早就说过：“游民无产阶级——由各阶级

脱离出来之破坏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可见，他们和马克思的认识相去甚远。何况他们对马克思学说，还都只挑各自所需的部分。

一 争当世界革命领袖

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他说，“看到毛泽东就跟看到斯大林的一个精确复制品一样。”¹又说，毛泽东讲起话来是“那么像斯大林”；他“像斯大林那样，害着权迷心窍的自大狂，对别人的看法也有同斯大林一样的病态观点。”²

毛泽东在国内是一位具有浓厚斯大林色彩的“革命始皇帝”。“革命”，一是革命必须持续进行下去，二是一切通过暴力和专政强力，以发动运动方式解决问题。“始”，是否定“大、洋、古”和“封、资、修”，一切由他从头来起，在中国这张“又穷又白”的大纸上随意挥洒，“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泽东争当世界革命领袖，是要运用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不断提升自己的领袖独裁地位，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统领国际共运。

世界革命需要领袖。1939 年毛泽东祝斯大林 60 寿辰时说，无论是革命或反革命阵线，必须有人当领袖，当他们的司令；马克思死了，恩格斯和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斯大林，谁下命令？

斯大林去世，毛泽东认为只有他才有资格接着当国际共运领袖。

毛泽东的这一抱负，早在取得全国政权前已有表露。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无比自信，认为对世界革命有普遍指导意义。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1946 年 11 月 21 日毛泽东就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面前预言，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可能比苏联重要些。

在《最后的遗言》一书中，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毛的“大跃进”目的很明显：很快超英赶美，就能把苏共远抛在后面，并超过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的全部成就。1959 年 12 月，他在苏共中央全会说：“他们（指中国）把自己的措施冒充为‘共产主义’样板。”

¹赫鲁晓夫 1960 年 7 月 16 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讲话。

²《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一书第十一章《中国》。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在谈到中国中央领导人时，对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均无好感，对刘、周还有批评，只对邓小平有所赞许。见该书第 391-392 页。

勃列日涅夫 1966 年 12 月 12 日说，中国领导人试图在共运中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为此发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毫不隐瞒“文化大革命”具有国际性质。

二 毛时代的援外

我们把国家的紧急需要丢在一边，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援外的最突出例子，就是 1950 年帮金日成打朝鲜战争。我国在百废待兴的 1950 到 1953 年，因为参加朝鲜战争，军费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高达 45%、42.1%、33.3%和 35.%有余。另据俄解密档案，周恩来告诉斯大林，1951 年比例为 52%；陈云告诉罗申大使，这年的比例是 63%。

我国援外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超过 1%。张闻天那时当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已经屡屡批评我们援外是打肿脸充胖子。1958 年后强调搞世界革命外交，全国接着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期间，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强援外。援外支出，1958 年到 1960 年为 9.9 亿元，1961 和 1962 年为 13.7 亿元，五年共计 23.6 亿元。其中给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和蒙古五个社会主义国家 18.7 亿元，亚非民族主义国家 5 亿元。

在进一步宣扬世界革命的文革期间，全国经济开始走向崩溃，援外负担更为沉重。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1970 年为 3.5%，1971 年 5.1%，1972 年 6.7%，1973 年 7.2%，1974 年 6.3%。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接管金边，我国立即运去粮食，同年 9 月赠予十亿元经济援助，包括两千万美元现钞。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农民大规模饿死，毛泽东却继续给外国人送粮食。全国普遍饿死人是从“大跃进”后的 1959 年开始的。这一年粮食产量比 1957 年减少了 1500 万吨，但出口却比那一年增加了一倍，达 400 多万吨，占当年储备量的 24%，够三千万人吃一年。那几年既不开仓济贫，又不进口粮食，反而大买黄金。只要两者择一，就完全可以避免饿死那么多人。

1959 年已开始饿死人，毛泽东 6 月批准出口 419 万吨粮食，占当时储备粮的 24%。到饿死人数已以千万计的 1960 年和 1961 年，仍然对外拨粮。1960 年 5 月，赫鲁晓夫挑拨中朝关系、拉拢金日成获得成效。为了挽回局面，同年 9 月，中国除了同意给朝鲜不用归还的四年贷款 4.2 亿卢布，还给了它 23 万吨粮食。同年 7 月，赫鲁晓夫中断了给阿尔巴尼亚

的粮食援助。中国当即补上，这年从 8 月到 12 月给它运去五万吨小麦，包括把中国从加拿大买的一批粮食中途转道运了过去。同年 11 月，格瓦拉访华，我们答应每年都用大米换古巴糖。同年，我国还“借”给越南十万吨大米，援助几内亚一万吨大米，刚果五千万吨小麦和一万吨大米。苏联出现过类似情形。苏联 1946 和 1947 年闹饥荒，饿死人不少，这时却给了捷克斯洛伐克 60 万吨粮。原因只是：苏联不给，美国就会给。

毛泽东在援外时还特别喜欢白送。他多次说“我们不当军火商！”除给了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各 200 亿美元，毛泽东的大手笔还如：只因蒙博托反苏，就一次性地给了他一大笔美元，数目记得好像是一亿；给中非皇帝三千万美元（这位皇帝把它全都用到了他的大婚上）。文革期间，我们在外交部五七干校听到传达，说毛主席把外交部因秘鲁（当时并未建交）受灾上报的五万美元援款，大笔一挥加上两个零，一下子变成五百万。周恩来传达时说，我们要好好领会毛主席的伟大革命胸怀！

三 领土赠予友邦

毛泽东不大计较中国领土的得失。这也继承了中国皇帝们的传统：享受君临天下、万邦来朝局面；以对藩国属国赐予包括领土在内的封赏，换取它们对天朝大国的臣服。毛泽东也有点把国家领土当作私产一样，高兴了可以把中国的领土拿出一块送给别国，不高兴了也可直接闯入同别国有争议的领土。耀武扬威一番，却并不以占领或者收回领土为目的。1962 年中印战争对印度就是这样的。毛泽东 1967 年 12 月 13 日会见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和印共左派代表团时说过，一旦印度人民掌握了政权，中国不仅会承认麦克马洪线，而且会把该线以南 9 万平方公里的藏南地区领土让给印度。

同周边国家划分边界，毛泽东很是大方，不怕吃亏。¹长白山（包括天池）的我国领土，让给了朝鲜一大块。毛泽东有一次和金日成谈得高兴起来，还说过以后整个东北都可以划给朝鲜。²为了方便运输援越物资，1957 年把我国的白龙尾岛主动送给了越南。中蒙划界，把原属新疆和内蒙的共计一万余平方公里土地让给了蒙古国。我们从小就知道片马

¹ 沈志华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在和缅甸、尼泊尔和蒙古的边界协议中最后所得领土分别占有争议领土的 18%、6%、34.4%。和阿富汗的有争议领土则是全部放弃。

² 因特虎深商读书会 2017 年 4 月 17 日网讯转发沈志华评论，说 2001 年金正日访华时向江泽民提出要考察东北，江纠正说，去访问可以，不宜提考察。金正日说，毛泽东已把东北送给了朝鲜，这是金日成生前对他讲的。江叫中联部长朱良查档，果有此事，虽然金氏父子是断章取义。

和江心坡在云南省，可是到中缅划定边界时这两个地方都划给了缅甸。珠穆朗玛峰本来在中国境内，为了照顾尼泊尔的感情，划界时把它一分为二。在中苏边界问题上，在中苏关系好的时候，两国边界相安无事，甚至有边无防。关系坏了，就一下子成了无法解决的大问题。我们提出，可以同意按旧中国和沙俄签订的边疆条约为基础划界，但要苏联首先承认这 150 万平方公里领土是沙俄侵占的我国土地，以此为进行边界谈判的前提。苏联不干，谈判久拖不决。其实毛泽东当时并不真想解决边界问题，更不想要回这一大块土地，他只是借此拖延谈判，好大做反苏“修”文章。¹

琉球群岛的归属问题，我们曾把照顾日本共产党的处境置于领土本身得失的考虑之上。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主权限于本州等四大岛及中苏英美“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过去琉球是个半独立国家，向中国也向日本朝贡。它的归属有待四大国做出决定。开罗会议时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交给中国，蒋没有要，就先由美国托管。美国后来又移交给日本管理。为了讨论对日和约，外交部 1950 年 5 月开了四次会，我参加了三次。在是否把琉球要回来的问题上，我们着眼于争取日本人民，主张在领土问题上采取能宽就宽的态度。与会的台湾和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说，假如把琉球给日本人，会给日本人民好的影响，何况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还是琉球人。²我也听廖承志谈到过，如果把琉球要回来，德田球一不就成了华侨，那怎么能行？³

四 输出革命

中国革命夺权胜利，毛泽东认为，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并已成普遍真理。共和国成立才两个多月，1949 年 12 月 25 日刘少奇在世界亚澳工会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就是关于这一点的一篇训话。他集中介绍中国革命的毛泽东道路，说这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应走的道路。1956 年“八大”政治报告初稿，又是一篇给各国共产党上课的报告。张闻天等人就此提出意见，后来报告才做出较大改动。

¹ 1964 年中苏第一次谈判边界问题。毛泽东的方针是，第一要让苏联承认条约不平等，第二不要求收回 154 万平方公里。只要苏联承认是不平等条约，有争议的 3.5 万平方公里可以不要。

² 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档号 105-00089-04（1）（原档号 105-C0062），1950 年 5 月 17 日。

³ 共和国成立后相当时期，日本问题不归外交部管，而归廖承志（廖办）管。

把中国革命理论推广运用到世界革命的顶峰，就是走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以取得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在行动上，毛泽东比斯大林更急切地推进世界革命。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考虑帮助解放朝鲜和越南。中共中央 1945 年 8 月 11 日发布接受日本投降向各地进军的七条命令。其中的第六条，要在华北的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等立即率部随同八路军进入东北，消灭敌伪，也组织在东北的朝鲜人民解放军，以便完成解放朝鲜之任务。1947 年 12 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说，要准备向胡志明领导的抗法斗争提供援助，等中共“打到两广时援助他们”。

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更是大力推动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在朝鲜战争和援助越南上，他表现得都比斯大林积极主动。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对印尼共产党寄以厚望。说过，未来世界革命的中心有可能转到印尼。印尼共总书记艾地是紧跟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可能觉得艾地日后有可能接过他的班，接着担起领导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革命重任。他已给艾地布置过任务：武装帮助马来西亚共产党。印尼共是中苏两大党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据艾地 1965 年公布的数字，在印尼，共产党员人数 300 万，共产青年团员 200 万，妇女会会员 200 万，工会会员 500 万，农民协会 1000 万，共计 2200 万人。艾地已经在印尼成功地和苏加诺结成统一战线，力量甚至打进了印尼军内。艾地说，社会主义能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共产主义则不能；这是因为，已经达到共产主义水平的国家必须拿出自己的资源帮助尚不具备条件者。中国党把这个观点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艾地还被请到中央党校做过大报告。陈毅在外交部做报告时也吹过艾地。可悲更可惜的是，1965 年一个“九·三〇事件”，就使印尼共全军覆没，印尼共的支持者大批遭殃。在印尼的大量华侨深受牵连和迫害。印尼军方采取的手段残忍，印尼民间也有不少人参与其事。这一严重后果，是因苏加诺的亲共警卫团三营营长翁东起事失败造成的。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其实都是列宁时期“军事共产主义”的翻版。毛泽东 1958 年 11 月 28 日和金日成谈过他对人民公社的设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文革时各机关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真的体现了这三化。缩小三大差别，是去高就低：城向乡，脑力向体力倾斜。干部、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大规模下农村下街道，从事体力劳动，向工农兵学习。“大跃进”时已提出要破除对“大、洋、古”和对“帝国主义（西

方)文明高尚”的“迷信”，文革中更对这一切做进一步的大破坏。缩小收入差别，毛泽东留恋的是供给制，认为这里面就有共产主义萌芽。当时邓小平也这样说过。反对资产阶级法权，“大跃进”那年第一次提出，后来又在文革中进一步强调。文革时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自愿”或被勒令纷纷腾出部分住房，让缺房少房户搬进去同住这类安排，就是落实这个理论的一项。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变“修”的一大论据，就是说苏联已经出现高薪阶层。其实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对干部特权开始做出些限制，包括实行干部轮换制，减少高级干部收入。这引起习惯享受特权的干部们的严重不满。可见，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只能体现“均贫”¹加“均愚”。

看来红色高棉实行的共产主义正合毛泽东心意。毛泽东 1975 年 6 月当面赞扬他们的所作所为说：“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很多经验比我们好，基本上是正确的，赞成你们。”红色高棉断言，通过取消城市、家庭、货币和商品，他们将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现了共产主义的国家。红色高棉的经验曾在文革中得到广泛宣扬，对他们的肯定一直延续到华国锋当党的领袖时和邓小平时代初期。这期间访问过柬埔寨的我国领导人，对他们的溢美之词可真不少。但是，联合国特别法庭仅根据红色高棉强制民众撤离金边而造成大量人员死亡这一条，就于 2013 年底宣判，农谢和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犯了反人类罪，判处他们无期徒刑。联合国法庭还在继续审理红色高棉大批滥杀民众的罪案。📺

【文 摘】

毛泽东的战争思想与共和国成立后打的四场战争

何 方

共和国成立后的 30 年里，同周边四个国家打了四场战争：1950 年的抗美援朝，1962 年的中印战争，1969 年的珍宝岛争夺，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四场战争均由我国挑起。直接战果是并无所得。长远后果是对我国国内发展和对外关系都产生了长期不利

¹ “大跃进”和文革后中国的贫穷化数据，见朱文轶文章：1957-1976 年，中国农村可耕地减少 11%，人口却增加 47%；1976 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 605 元，比 1966 年的 636 元下降 4.9%，很多人每月实际拿不到 50 元。《三联生活周刊》2006 年 10 月 26 日。

影响。在毛泽东时代，我国曾成为世界上唯一最好战的大国。四场战争全都打错。

关于朝鲜战争，本书下一篇有详细论述。另外三场战争，前面几篇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一一详述。下面只简要谈谈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决定打这四场战争，所为何来。

事情得从毛泽东的时代判断和战争思想说起。

由于对时代判断错误，毛泽东总是过高估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革命形势的成熟度。战争和革命不可分，“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是他不断在全国采取备战临战大行动的理论根据。在共和国成立后的 30 年里，除了打了四场仗，全国几乎没有停歇过备战。备战活动一直深入到各省乃至基层建设。文革时期，战争危险更一度被强调到“已迫在眉睫”、准备“打大战”、“打核战争”的地步。

大约在 1970 或 1971 年，外交部湖南干校的全体“五七战士”，听到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卜占亚到北京开会后向全省做的传达：毛主席说，我们得做好解放（也就是打）台湾的准备；给各省准备接管台湾，做了分工。卜占亚具体说了要湖南接管的具体领域，已经忘记是哪个。为了备战，各省建设都要适应战时需要，在战争爆发后都能自造武器弹药及运输工具，都能独立作战。在湖南，部队医院大力提倡用针刺代替注射麻药止疼，用在农村和山区到处都能找到的中草药代替西药治病。干校和地方上的“赤脚医生”们跟着部队医院的医生，学的就是扎针和大量辨识草药的本事。

关于对时代的误判，前面各篇已有阐述，不再多谈。这里专谈毛泽东的战争思想。

毛泽东讲战争，既指世界大战、民族独立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他也把美国的反共反苏反华言行、苏共反对中共的路线斗争视为战争，统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毛泽东 1959 年 11 月 3 日明说：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因此讲美国发动战争，也不是指武装进攻，而是指政治斗争。美国的“和平演变”政策，一直被看成是美国对我国作战的主要方式。

毛泽东早已把苏联定为“修正主义”。1968 年为了终止“布拉格之春”，苏联又出兵

捷克斯洛伐克。毛泽东更以此为由把它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从此苏联就成了对我国乃至全世界的首要战争威胁。当年外交部副部长余湛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专论，把列宁《帝国主义论》所举的帝国主义五大特征，一一直接套用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头上。说明：凡是帝国主义，它们的本性就决定他们注定要发动战争。其实，无论是出兵捷克本身，还是勃列日涅夫提出的“有限主权论”，都是按国际共运规矩办事。在中苏两党闹翻前，这类做法和说法，同当年帝国主义国家为占领殖民地而发动战争，根本沾不上边。

把在我们党内高层进行“路线斗争”说成是打仗，是毛泽东的口头禅。一在党内高层发动“路线斗争”，他就会说准备拉着队伍重上井冈山。也就是，重打一次天下。江青在文革集会上讲话，开口闭口都是“打仗”。说她是领着革命小将们“打仗”来了。她拉着几位教授跟着她上台“评法批儒”，也宣布：今天来“打一仗”。

毛泽东认为，只要还没有把国内外资产阶级全部消灭干净，内战外战就不可避免。这既指“武”战，更指“文”战。他承袭了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衣钵，但又大有发展。他把这一点运用到了在党取得执政地位后在国内还要继续进行不懈的“阶级斗争”上。他创造出了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又创造出实践经验：依靠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来推进继续革命。

由于国内外阶级敌人从来都相互呼应、相互勾结，因此外斗和内斗不可分割。这一点，毛泽东和斯大林倒是完全一致。他们都把本人认定是政敌的对象说成是外国奸细。我国的高饶、彭黄张周、刘少奇、林彪全都有“里通外国”这一条。刘干脆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连毛泽东怀疑可能成为下一个反党头目的对象，也会事先警示性地提到。1973 年他有意动一动周恩来。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同年 11 月 28 到 12 月 5 日的批周扩大上传达毛泽东的话：“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的儿皇帝！”毛批周的由头是当年外交部第 153 期《新情况》事件¹，以及周恩来 1973 年 11 月 13 日和基辛

¹ 外交部 1973 年 6 月 8 日出的内部刊物《新情况》所载文章对美苏关系的估计使毛泽东大批周恩来：“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格的谈话事件，针对的是周对美国的态度。但却说他想当“苏联的儿皇帝”。说明毛泽东心里更放不下的是周恩来早年同共产国际的深厚关系。难怪他批周时调出当年他所写激烈批判包括周在内几篇一直未发表的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宗派”的文章，反复阅读，还作出修改。

毛泽东把他推翻民国政权的打内战成功经验，直接或改变表现方式套用到世界革命、对外作战和对内继续革命的战略策略上。

在世界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把在国内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直接推广到国际上，即“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的战略。

对外对内作战、无论进行文斗还是武斗，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路相通乃至一致之处很多。包括计算敌我力量对比，打仗依靠什么取胜，战而胜之的信心，斗争的方式方法。

毛泽东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看法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一切取决于毛泽东如何估计个人领袖独裁地位的牢固程度。感到全无问题，对国内外形势的评估就是一片大好。察觉甚至只是怀疑可能出问题，这时就会断定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严峻，敌情严重。毛泽东采取的对内对外战略策略，从来就是相互为用。

计算敌我力量对比，毛泽东对内对外高度一致：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和社会制度因素。人的因素指的是敌我双方各自拥有人口的多寡，双方谁怕谁不怕苦不怕死。社会制度因素，指的是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共产党、和对资本主义制度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人心向背。人心向背是根据他本人的估计。毛泽东坚信，他在党内国内已经牢牢树立起不容任何其他领导人挑战的个人崇拜地位，在国外的威望也蒸蒸日上。人数多寡可以量化。毛泽东 1957 年在莫斯科首次做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说了两种制度国家各自的人口总量。他对我国留苏学生说，东风压倒西风，我们人多他们人少，不久他们就会发生地震。中国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数量是“一小撮”，绝大多数都是拥护共产党或是可以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在国内，这“一小撮”占全国人口 5%的比例源自延安整风。1955 年 10 月 22 日陆定一奉命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介绍当时的肃反运动。他说，延安整风中异己

分子占 5%，这次肃反把反革命分子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定为 5%，显然正确。在国外，各国人民都是好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坏的只是统治阶级一小撮。军民怕不怕死，被看成是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持价值观的优劣决定的。中国人不怕死，美国人就最怕死。

和外国作战，仗的是我们兵多，相信人海战术是取胜之道。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就搞人海战术。毛泽东 1951 年 3 月 1 日报告斯大林：花几年时间，拼掉美国人几十万生命，中国拟用它巨大人力资源拖垮美国；军队已死亡 10 万人，估计今年还得死 30 万；中国准备和美国打一场持久战。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1957 年毛泽东向他提出，如果苏联遭到进攻，不应还击，而应撤退；撤至乌拉尔山，坚持两三年，有中国做后盾；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你们需用多少师打垮他们，我们就给你们多少师，一百个、二百个、一千个都行。毛泽东 1969 年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也说，准备打仗，打起来放他（指苏联）进来好，让他陷入人民战争汪洋大海中。

坚信和帝国主义开战必胜还有一条：我们不怕死。毛泽东多次说，我们人多，还不怕死，而美国人最怕死。他 1957 年 1 月 19 日对葛罗米柯说，美国最怕死人，打死几百人，对他们来说就非常严重了；如果他们伤亡 200 万到 300 万，那就等于美国的灭亡。毛泽东在“九大”发言谈珍宝岛战争：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打，主要是靠勇敢；珍宝岛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

不怕打核战争，也是因为人多和不怕死这两条。1957 年在莫斯科说，打起核战来，人类死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也不怕。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军内有对中国动核手术的设想。毛泽东召开军委会，所有军委领导都表示不怕原子弹。毛不同意对苏联进行核报复，提出：一旦苏联动用核武器，我军可全部快速进入苏境，多批次全方位进攻，地方独立武装、武装民兵机动跟进，全部武装占领苏联领土，全民移民苏联。还提出，苏联一旦对我动武，我就对美军动武，美军用核武器反击中国也无所谓，做好再次搬家到美国的准备。据说消息通过波兰传给苏美，苏美全都慌了。

毛泽东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包括核战争，只因深信战争结果只能是帝国主义和资本

主义在世界上彻底消亡，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在世界上全面胜利。他早就提出过这一信念。文革期间，“世界大战，第一次打出了个苏联，第二次打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第三次必将打出全世界一片红”的说法，几乎成为国人特别是“革命小将”们的普遍认识。一批“小将”还跑到国外去，直接参加那里的武装斗争革命。

但是，对于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毛泽东都并不大相信真的会发生。特别对帝国主义，他基本上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和葛罗米柯谈话时，他明确地说，正是因为美国人怕死，美国不敢进攻我们。

他真正担心的是，美国用西方价值观、苏联用“修正主义”来演变中国。即西方以“和平演变”，苏联以反对个人崇拜和开始采取不同于中国的改革措施，在中国造成毛泽东定义下的“资本主义复辟”，即“亡党亡国”。这是“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说的真正含义。苏共不是已经被西方成功地演变了过去吗？但是，如果不同时强调美苏真有可能对我国发动战争，不真地采取备战行动，又不足以使“外国侵略中国的危险”始终成为国人注意力中心并愿“为国”做出各种个人牺牲。

毛泽东对美国“和平演变”的担心，在于它有可能在我国的社会层面发挥影响。这一条，对于在中国持续推行党国体制确实可能造成一定的障碍。对苏“修”影响的担心，那就更大也更加现实了。因为苏“修”直接针对的已经是毛泽东个人。何况根据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在国际共运内各兄弟党间，在各党党内，都早就存在不听话、不换思想路线就换人的传统。还不能排除为维护“政治正确性”而动武，开杀戒。在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国家，决定开战只需要党中央特别是领袖下决心就行。不像三权分立的西方国家，决定能不能开战是很麻烦的。说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是毛泽东当时的真实认识。

中国和苏联同是一党专政国家，摸得着彼此的脾气。勃列日涅夫是真怕中国对苏联动武，这才有军事包围中国之举和对中国“核手术”之议。毛泽东也真的担心苏联有朝一日确有可能在军事上对中国动手。全国的战备活动，1950年代上半期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其

规模和程度，远不及后来对苏联。

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上推行同样的统一战线战略策略。首要一条是划清左中右、敌我友界限，以确定联合、中立或打击的对象。在国际上提出的“中间地带”论、“三个世界”论、“一条线战略”论，都是如此。毛泽东时代在国际统一战线上所作的最大调整，就是从共和国成立早期的“以美划线”，转到中苏两党决裂后的“以苏划线”，甚至决定“联美反苏”。

具体战术或策略运用也大同小异。“诱敌深入”和“引蛇出洞”，让人感到正是异曲同工。都是先放后收，“聚而歼之”。在对外战争中“诱敌深入”，执政前是“让开大路，退到两厢”；执政后是不发展沿岸和边界地区，战时准备从这些地区退出，转入内地“三线”地区，诱使敌人长驱深入到我国境内，以达“关门打狗”，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对内，是先诱人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然后倒算账。

战争和战争气氛有利于世界革命和国内继续革命，毛泽东是直言不讳的。毛泽东公开提出，国际形势紧张对国内外继续革命有利。1958 年 9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直截了当地谈到国际紧张局势如何对处理国内问题有利：可以“调动人员，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斗争”；民主党派“过去心里有些疙瘩，有些气的，受到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1959 年 3 月 3 日，他接见拉美 15 国共产党领导人时也说：“局势愈紧张愈好，各国共产党可以比较迅速地发展，革命会更快一些。”因此，他也在有意渲染甚至制造战争危险论，国际局势紧张论。文革期间毛泽东把国际形势主要特征定格为“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这是为了替世界革命形势大好鼓劲，却并不符合当时总的国际形势发展正处于比较缓和阶段的实际。

还有一条，即和平状态是培育“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这同怕让干部和民众富起来会“变修”、“资产阶级化”，出于同样的理念。

毛泽东说过，政权就是军队。军队随时准备为贯彻党领袖定下的方针路线“保驾护航”。备战、进入临战状态和实战，还是练兵的需要，防止军队松垮涣散的良方。

毛泽东决定打的三场、邓小平决定打的一场战争，从战略思想到战术运用都源于毛泽东的上述战争思想。下面只简要谈两点。

第一，四场战争都出于世界革命理念。

抗美援朝战争，这是毛泽东为推进世界革命而采取的第一次重大行动。

早在抗美援朝之前，毛泽东就开始援助越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先是援越抗法，后是援越抗美。这同样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中国早就在军事上深深介入越南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解放军也在越南流血牺牲。陈赓大将曾被派往越南，成功指挥了抗法的奠边府战役。毛泽东和周恩来不止一次表示，中国愿为援助越南做出最大民族牺牲，包括出兵和直接到南越帮助作战。我国为越南大量无偿提供各种援助，持续运去大量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长期派去军事顾问和数目可观的军事和工程人员。常常是越南主动提出要求，中国慨然允诺，越南欣然接受。只有一条，胡志明和继任的越南领导人全都婉拒，这就是中国几次提出的直接出兵相助建议。为了援越，我国耗费了巨量物力、财力和人力。只因从来没有直接出兵越南，就没有列入共和国成立后所打战争的序列。但为越南长期大量提供那么多援助，和其他支援世界革命行动所耗费的一样，只能使政府在财政上更加捉襟见肘，更难满足国内的各种民生需求，包括能让中国人少饿死一点的最低民生需求。

在中苏两党反目之前，毛泽东援越抗法抗美（以及抗法抗美之间的抗美援朝），是为了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之后，在继续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又增加了同苏共争当国际共运领袖的因素。此刻的大量援越（以及援朝），就多了一层同苏共争夺对越共（朝鲜）影响的考虑。从 1969 年开始，在认定苏联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已经超过美国，“联美反苏”政策从开始酝酿到不久后正式形成，我国对外开始从“以美划线”转到“以苏划线”。如何平衡“抗美援朝”和“联美反苏”？围绕向越南继续提供援助和促进越南和谈，中国对越、对美、对苏展开的外交活动，多种因素交错，十分复杂。

毛泽东 1962 年发动中印战争，仍然同他的世界革命思想不可分。此战倒不是为了推动印度共产党在印度发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尽管对印度这个国家及其统治阶级的定性，早就

存在着问题。是把印度统治阶级看作革命对象还是争取对象？毛泽东认为是前者。本书第二篇谈到过毛泽东和张闻天对由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领导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不同看法，这里不去重复。毛泽东把尼赫鲁定成“帝、修、反”中反动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领先人物，因此是主要打倒对象之一。赵朴初从1963到1964年连续写出“哭三尼”套曲，毛泽东大加赞赏。三尼即肯尼迪、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赫鲁。由胡乔木执笔，《人民日报》发表过讽刺挖苦尼赫鲁的专文。毛泽东把尼赫鲁称为“半人半鬼”。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和苏联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直接相关的因素。当时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好于中印，苏联在印度的影响大于中国。苏联给印度提供了大量援助，尼赫鲁和赫鲁晓夫的个人关系也很好。而斯大林是早就把领导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特别是亚洲民族民主革命的权力授给了毛泽东的。

还有一个和世界革命也有间接关系的因素。尼赫鲁长期在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享有崇高威望，还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人物。而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使他成为所有新独立国家的当然引领者。

我一直感到，我们是对不起尼赫鲁的。印度独立后，在西藏问题上和中国一直存在着矛盾，同中国也一直有领土和边界纠纷。但是，同样在尼赫鲁治下，印度一直对中国很友好。印度对中国国共两方的抗日都支持。共和国成立后，印度对中国长期采取友好态度，在国际上和在联合国内不断开展对我国有利的外交努力。当然，在毛泽东的外交决策三原则下，中国不一定把印度所做努力都看成对我们有利。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旬，亦即在毛泽东短暂表现比较开明的那个阶段，中印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国关系曾高度友好过一阵。后来中印这两个伟大国家的关系变坏，实在可惜。

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是事先经过我们周密准备，选好了时间地点，突然向苏联发难的。战争本身为时不长，双方流血不多，但是意义重大。发动这场战争标志着中国党为同苏共争夺意识形态正统地位和国际共运领导权进行的斗争，已到不惜同苏联兵戎相见的地步。这场战争把中苏分裂从政治领域一下子推进到军事领域。苏联的反映强烈。不仅同年

8 月就在新疆铁克列提对我国边防军采取直接报复行动，还从此在我国周围大量增兵、实现了对我国的军事包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下子有了军事后盾，真正成为对我国的重大安全威胁了。

邓小平 1979 年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动因比较复杂。在世界革命思想范畴内的争夺共运领导权也是因素之一。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反对柬埔寨的红色高棉。而我们是坚决支持红色高棉的。中越两国之间一直存在着领土和边界纠纷，历史悠久。但光凭这个，并不能成为打这场仗的充分理由。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想借此使毛泽东定下的“联美反苏”国策得到进一步强化，使中国在美国获得更大实惠。邓小平访美时已经认识到，和美国关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发展的快慢。他专门选择在对越南采取行动之前访问美国，向卡特交底：苏联是中美的共同主要对手，他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教训越南”，是因为越南跟着苏联跑。卡特并未表示支持中国对越采取军事行动。但是邓小平进攻越南发生在他访美之后，却增加了苏联在军事上帮助越南抗击中国的顾虑。此行确也大有助于使美国进一步近中国远苏联。

第二，打这四场战争，都是为了直接配合毛泽东和邓小平各自进一步掌控党政军大权。

1950 年参加朝鲜战争，对于巩固刚刚成立的共和国政权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毛泽东因打这场战争在国内外的声威大振。这些在第六篇已有详述。

1962 年秋发动中印战争，恰逢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半年之后。这里就有毛泽东此时已下定最后打倒刘少奇的决心这个重要背景。为倒刘而开始采取的主要对外措施就是，决定和苏“修”公开决裂。这是为给刘少奇最后戴上“中国的赫鲁晓夫”帽子留下的伏笔。苏联塔斯社 9 月 9 日对中印冲突采取了中立态度。这成为一个重大由头：苏联竟然在兄弟国家和非兄弟国家的争执中没有采取无条件站在兄弟国家一边的立场。这岂不是对国际共运章程的离经叛道？就这个问题大做反对“苏修”文章，还有助于煽起国人对外反对“帝、修、反”的民族主义情绪。

珍宝岛之战，正值毛泽东准备召开“九大”。他把林彪定为接班人，还郑重其事地把

这一点写进了党章。同时，他也开始做在林彪之后由“四人帮”接班的准备工作。但是，毛泽东当时就觉察到林彪不会接受由他所看中的张春桥辅佐江青接班的安排。他不用由陈伯达起草、反映了林彪有关今后全国工作安排设想的政治报告稿，而让林彪在“九大”上宣读由张春桥起草的稿子。林彪念稿时无精打采，被毛泽东看在眼里。

“九大”后，备战的调子越唱越高，与此直接相关。1969年9月，毛泽东在国庆20周年口号稿中加上了一条：“从现在起就要（对任何侵略战争）有所准备！”，同时开始动员紧急战备疏散。

九届二中全会进一步证实了林彪在林后接班人问题上和他存在的尖锐矛盾。只是林彪在国共内战中立下赫赫战功，在军中长期享有很高威望，在高级将领中有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毛泽东就一方面从打倒陈伯达下手，对林彪开始旁敲侧击。毛泽东的想法是动摇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威信，以此压林彪就范。作为重大防范措施，更借珍宝岛之战引起的中苏军事关系紧张，不断加码强调苏联是我国的主要军事安全威胁，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迫近，备战活动更是不断升级。林彪口头上也强调战争危险和备战的必要，私下却认定苏联是不会进攻的。

毛泽东在“九大”后即大搞紧急战备疏散。他本人和林彪暂避外地。在短短几天里，在文革中已被关押的高级领导人全部、挨斗的大部都被赶出了北京。在北京的大批干部，为数更多的知识青年，下“五七干校”的下干校，上山下乡的上山下乡。

这些行动均含有为防范发生“政变”，控制异己力量的成分。

邓小平决定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发生在他接华国锋的班立足欠稳的时刻。他需要在军队中为自己树威。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同每次防范或准备发动不同形式“政变”时的情况一样，主事者都是首先抓军队。邓小平明说，兵要靠打实战才能练出来。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后中越边境战争连绵不断多年，那里真的成了解放军的练兵场。

“六四”时，邓借学生“闹事”，开动大批军队，竟连大量坦克都上阵，大开杀戒，枪杀或压死无辜学生和群众的人数至今严格保密。其实邓要对付的并不真是手无寸铁的学

生，而是意在威慑赵紫阳的力量和影响上升。已经有多位将军和包括李一氓在内的老资格革命家表达了反对戒严、开杀戒的意见。

最后，以简单谈谈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异同，包括外交上的异同结束本文。

一，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邓小平理论并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只是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

二，邓在毛后一段时期内继承毛的是：和战问题，反“修”，世界革命，大国主义，边界问题，“教训越南”等。

三，邓对毛的修正和拨乱反正是：向资本主义开放，引进外资外企，设立特区和免税区，开展外贸外经两个市场。逐渐采纳李一氓和宦乡等人的一些建议。包括：转变对爆发世界大战可能性的看法；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取消“打倒帝修反”口号，不再保持原来那种共产党间的党际关系；削减外援；加入国际社会，承认国际惯例；不再“联美反苏”、在外交上同美国拉开一定距离。

四，在外交上，邓、毛的根本区别是闭关自守与改革开放。邓见过世面，毛只是坐井观天。毛是完全封闭，邓是部分封闭。


（一）在内政外交决策上，毛完全是由个人说了算。邓还不能做到完全由他个人说了算。陈云的发言权很大。

（二）毛、邓对外都是一个时期突出一个重点，单打一。如台湾问题，打掉日本常任理事国企图，会见达赖喇嘛，打击法轮功。

（三）从反美到反苏两次划线的变化，毛、邓一致。都不是有理有据的成功国际战略。

（四）从“以我划线”到“以我为准”。毛、邓都不承认普世价值，如人权、人道、三权分立等。怕“西化”怕“演变”，既是拒绝文明，也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

（五）以“历来主张”为“证”，毛、邓都以一贯正确自居。头 30 年以对“顶峰”态度划线，后 30 年以“中国特色”相框。

（六）毛、邓都属于“宣传”拜物教。改善中国形象不能只靠对外宣传。“软实力”的形成，不在对外宣传方面的巨大投入。

【文 摘】

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¹

何 方

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关系，是指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高，人们都归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国内工作方针作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也就是改“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长期以来，人们却提得不多，可能重视不够。其实，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际上，这两个拨乱反正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对世界形势的根本判断，是我们制定对外和对内政策的基础和前提。试想，如果我们一直认定，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那还能放心大胆地埋头于经济建设吗？正是在这个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拨乱反正上，胡耀邦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是认识比较清醒、也提出得最早的一位，对我们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在这方面极为丰富的思想和实践，或被抹杀，或被歪曲，人们很难看到历史真相。所以，进一步挖掘、研究和发扬这方面的宝贵遗产，不仅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联系这些年的情况来看，更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在纪念他逝世 20 周年的时候，我也就不揣浅陋，在这个问题上做点初步的梳理和探讨，不知能否起到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为什么要把胡耀邦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在对外关系上的认识和工作，叫做拨乱反正呢？这是因为，至今的主流舆论，直到党中央，从来都只承认我们国家，特别是毛主席，在国内工作中犯过“左”的错误。虽然极不彻底（国内问题上，胡耀邦的看法也和党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有很大不同），但终究承认有错误，因此自然要进行拨

¹本文引用胡耀邦的话均出自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

乱反正。但是对世界形势判断和外交问题，党中央，也就是它的主要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个不短的时间里并不承认犯过错误，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拨乱反正问题。后来虽然不得不改变一些看法、对外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但还是肯定过去，不提拨乱反正，或者加以淡化和回避。这表现在研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期间，邓小平就断然否定了胡耀邦着重于总结经验、汲取教训的提纲和意见，而坚持重点为维护毛主席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旗帜，以及更多地肯定过去，特别是对国际和外交问题的完全肯定。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节里，谈到毛泽东对文革“的全局性的、长时期的‘左倾’严重错误”时，却又说，“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壓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对照我国后来对国际事务的实际认识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上的实践，《决议》的这些论点还能站得住吗？正是这种外交上一贯正确的论断，使我国外交部在对外表态中才习惯于使用“我们历来主张”、“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这类提法。这就很难讲得通我们在各个时期都有的政策调整，特别是文革期间提出的“一条线”战略和改革开放后在世界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上的根本性变化。而这种一贯正确说法和前后不同做法的两相背离，只能以对研究讨论设禁区来掩盖。但这样做，对自己来说，就无法认真汲取经验教训，使我国60年来极为丰富的外交实践难以得到科学总结，上升为系统理论，有些情况甚至连做到自圆其说都不易；对外来说，会减弱我国一直在做的使别国对我国增信释疑的工作效果，损害国家的形象，给人留下我国对外不透明和不讲真话的印象。

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初期的领导人中，胡耀邦就反对掩盖错误，主张总结经验，还历史本来面目，从中汲取教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是由于他虽然处于总书记的岗位，却受毛泽东思想和当时“老人政治”领导格局的制约，对重大问题的发言权有限，更不用说决策权了。在强调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则下，他的一些独到见解和锐敏看法，就不能坦率提出和公开表白，只能讲得很婉转，甚至很隐晦。即使在内部或其他场合提出某

些和邓小平、陈云等不同的意见，媒体也很少报道，更不会得到宣传，所以也鲜为人知。例如对建国头三十年的错误，邓、陈和中央的正式提法，都没有提到路线高度，时间也控制在二十年，更多地还是限于文化大革命。可胡耀邦却多次提到过去犯了“极左路线”的错误，而且不限于文革，在十二大报告中就说要“对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但是，为了同中央保持一致，他的许多独到见解，不但不得不讲得极为含蓄，甚至往往还要附和两句他并不同意的相反提法。例如他多次讲过战争打不起来，但后来在十二大报告中还是不得不加一句邓小平一再讲的“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虽然有这么多的曲折和对不同意见的附和，不过只要我们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探索，特别是从同一时期和主要领导人对同一问题讲话的对比中，就不难发现胡耀邦的敏锐思想和独特见解。这方面最容易被埋没的，也许就有他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外交政策上的高瞻远瞩。这也是本文特别标明他在对外关系中进行拨乱反正的原因。

胡耀邦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勇于正视我国对外关系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及时进行调整和改变；在拨乱反正中，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的新依据、新原则、新方针，以及外事工作所应采取的新做法和应具备的新风貌。这是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值得我们，特别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进行外交工作的人员认真研究和学习。这里就先对以下三个问题作点初步讨论。

一，对世界形势和时代问题的新判断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胡耀邦最早看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特征，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主要潮流是发展而不是革命。

（一）对时代特征的判断是国家对内和对外战略决策的根本依据

关于时代问题，中国学术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进行过长时间的热烈讨论，到九十年代上半期才渐趋一致，这就是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虽然至今还有人不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但是也不能和不敢否认这两大时代特征。既然如此，

就很难说有个不由基本特征决定的别的什么时代了，再争论也只能是抠名词了。说“不敢”，是因为党中央在 1987 年十三大报告中已正式宣布“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也即时代特征的提法。可此后又为什么还有人不同意把时代特征和时代结合在一起呢？这就很难说了。也许是由于固守列宁和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提法，或者是受“‘左’比右好”的传统影响的缘故。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接受“左”派人士至今还坚持的这一提法，并且一直持续下来。由于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战争与革命（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所以人们也简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是这样说的。直到建国后头三十年，我们还更强调这一提法，当然也就按这一判断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了。这就是：对外，打倒帝、修、反，支援世界革命；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从不断革命发展到“全民皆兵、准备打仗”，而且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人们也越来越看得清楚，这一判断和决策，不但使中国丧失了一个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机遇，而且把国家推到几近崩溃的边缘。经过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全国从上到下才逐渐觉悟到，不能再这样胡折腾下去了。

出路何在？除了在文革中的“四人帮”追随者和少数不愿放弃既得权益和思想极保守的“左”派以外，全国上下在必须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这一点上很快就达成共识。这就又碰到了对世界形势和国际环境的估计，也就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了。

集中搞经济，人们的思想转变比较容易，但改变对时代的判断可就比较难一些了，因而需要经过一个时间不能太短的过程。特别是当年参与决策并长期积极执行的领导人，要他们改变过去坚持的观点和否定自己的长期作为，那就更加困难一点。所以按邓小平创立的“核心论”，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除胡耀邦（也许还有别人）外，主要领导成员在决定以经济为重点之后，对时代问题的看法，是“战争与革命”还是“和平与发展”，就一时变不过来。陈云恐怕对传统论断坚持了一辈子。因为直到 1989 年，他还针对和平与

发展时代问题的讨论，发表了《帝国主义本性没有改变》的谈话，说“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为此，邓力群还专门组织北京思想界和学术界部分人士对和平与发展时代做了四次批判和讨论的座谈会（见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就是邓小平本人，作为以前的反修先锋和这时的领导核心，大约文革后还经过了将近十年才逐渐改变了对时代特征的观点和判断，而且还说得比较含糊。由于他是核心，所以只有他的变化才意味着党中央的变化。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外关系，也只能以这一判断为根据，进行调整或改变。可见，邓小平在时代判断上的转变对我们国家是多么重要。这就值得多说几句了。

对时代的判断首先是对战争（邓小平说，“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104 页）的看法，邓小平是经过了一个极缓慢的变化过程的。文革结束后头三年，仍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还一再强调战争因素在增长。例如 1979 年 7 月 18 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明显针对胡耀邦头一天的讲话，讲了一篇强调战争危险，强调“一条线”战略思想的话。他说，“国际形势比前一段更加动荡，战争因素更加增长，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以后还要更加动荡，战争的因素还会不断增长。现在公开议论战争的人多起来了，这不是无风起浪，战争的危险确实实在增长。”“战争要来只能来自苏联，要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要采取‘一条线’的思想，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要肯定苏联叫社会帝国主义。”（转引自《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这当然影响内外决策。所以那几年，对内并未放松备战，如大小三线的建设；对外，还提高了“反修”的宣传教育，直到组织人员编写《社会帝国主义论》；更加强调苏修是战争的主要根源和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因而要进一步加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以至导致以武力“教训”越南。

那几年，对国际形势与对外关系，特别是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完全继承文化大革命时的估计和做法，有些地方还提得更高了点。这集中地表现在胡乔木受命起草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1977年11月1日占了整六版的特长文章中（在为胡耀邦起草十二大报告时，胡乔木又对李慎之等人说，那篇文章是胡说八道）。

之后的三四年，邓小平的看法逐渐转变为战争有可能推迟，至于推迟的年数，从起初的三五年到不久后的十年，再到争取二十年或更长时间。这在他带头决定国内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就显露出对国际形势估计和国内建设发生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他的许多谈话中都可看出他内心由此引起的焦虑。例如他一再讲要争取十年、二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和平，使我国经济有个大发展（直到1984年2月还对外宾说，“中国需要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建设。”）另一方面又老讲战争不可避免。那就正如他事后所说，整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安心搞建设？我们建设得好好的，等战争一打，一切不又完了。显然，这种看法必须改变。从他自己修改审定过的《文选》看，他的变化开始于1984年10月10日同德国总理的谈话。他说，“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

完全改变，可能是1984年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就是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够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对这一判断的正式宣示，则是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主要谈的就是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转变。第一个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

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是改变了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此后，经过党的十三大，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或时代特征就完全定下来了，至今 30 多年再无变动，大约今后相当长时期都不会再变了。

邓小平和以他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时代判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当然是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一客观需要的推动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对国内外舆论和我们自己有关机构所提交科研成果的审视与采纳（例如，1980 年李一氓就提出和平可以维护，三个世界的理论站不住，应当承认苏东各国为社会主义并和外国兄弟党恢复关系；宦乡也早提出应和美国拉开距离、对苏调整关系的研究报告），更不排除对领导成员中不同看法的考虑。这里要特别一谈的首先就是胡耀邦的思路和提法。

（二）在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战争与和平的新见解和新判断

如同我们前面说过的，胡耀邦由于他的身份和处境，改革开放初期在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上即使有新见解，如果同中央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等多少有所不同，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宣讲。但是从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特别是盛平所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中，就能发现，涉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特征，他有一系列早于其他领导人的谈话和提法，而且是有系统的，并不是偶尔说过那么一两句。

胡耀邦早就不同意当时流行的所谓“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苏联”的说法。他也明确反对把苏联进攻我国看成发生战争的主要危险。1979 年 7 月 17 日，他在我国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也就是上引邓小平讲话的那次会）上说：“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个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说法必须重新考虑。我们必须把苏联统治集团奉行的政策同它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不然我们在外交政策方面和理论方面就站不住脚。”“苏联统治集团反华，二十年来亡我之心不死，但不等于他要搞亡我之战。他要搞对华战争，进行亡华之战，我觉得不容易。他的决心不容易下。同时，苏联人民以及相当多一部分干部，对我友好之心

未灭，希望同我们友好。单看领导集团亡我之心不死是不全面的。”他的这些完全正确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央领导中并未得到响应。前引邓小平在第二天会上的讲话，更是对他的直接批驳。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战争的评估存在分歧，在当时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了。

胡耀邦也很早就注意不要在宣传上老讲“战争不可避免”、“打起来也不怕”、“全民皆兵，准备打仗”之类的话。认为这些话不但不符合实际，在世界舆论中显得孤立，而且严重影响我们的国家形象。1981年3月9日在中央书记处专谈外事工作的会议上，他就说：“维护世界和平这面旗帜，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由于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早有明确认识，所以在邓、陈等主要领导人和主流舆论还在不断谈论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断然指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当然，由于中央领导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还存在分歧，他对和平的观点虽然成竹在胸，报告中也还须提得面面俱到一些。不过在国际问题研究界却把十二大看成了分界线：在这之前的中央提法是战争不可避免（只能争取推迟），之后已变为和平可能维护了。宣传上，也从此显著降低了战争威胁的基调，而主要是讲和平了。

胡耀邦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提法，是自觉地出自对时代特征的理解，就是说，这是对时代认识的新观点。因为，胡耀邦非常了解正确认识时代所涉及问题的重要性。例如1985年7月15日，他在中央党校学员毕业典礼上作报告时就明确提到，“如何观察形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门大学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上的一个大问题。只有正确地观察形势，才能够正确地决定奋斗方向和方针政策。”

胡耀邦由于对战争与和平一直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所以在邓小平提出世界存在两大问题并正式宣告改变对战争的判断和放弃“一条线”战略之后，他就更加强了对和平与发展的强调和宣传。例如1986年6月访问英国期间，他在回答《大公报》记者的提问时就有针对性地说，“十几年以前我们所提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看来讲得太绝对了一点。应该纠正这一观点。”

（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支援世界革命问题上的拨乱反正

毛泽东是列宁主义者，历来主张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后，支援世界革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认为世界革命中心已移到中国，他也已成为世界革命领袖，支援世界革命也就更公开更积极了。邓小平在文革前以及此后相当时期，都是毛泽东对外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执行者，特别是在反对“苏修”的斗争中还受到毛的高度赞扬。毛后来对他的不满主要是在国内问题上，文革后期重新启用他时，讲的理由之一就是他反修坚决、立了功。

事实上，中国对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援世界革命的立场也一直都是公开的，多次表示我们为援助外国革命“不惜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毛泽东 1975 年 7 月就曾对泰国总理克立说：“（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邓小平在文革后的 1978 年 3 月 31 日，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也说，“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朱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炎黄春秋》2008 年第 11 期，日期见《邓小平年谱》。）

胡耀邦文革后的认识就截然不同。1977 年 5 月他在一次针对一份中央文件中称“四人帮”是“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谈话中，就曾对反对“苏修”、支持世界革命的《九评》持否定态度，说，“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的，这个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他还问道：“在思想政治或者其他领域，到底应该反对资本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还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对流氓无产阶级？”他在十二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

根据列宁解释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是要一国无产阶级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二是取得胜利的民族要为推翻国际资本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本身就是输出革命，

所以苏共二十大后已不再多提。但中国党的反修，却首先从反对赫鲁晓夫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开始，因此特别强调坚持和履行国际主义，把支援世界革命的旗帜举得更高，实际行动也更加有力。其实，在共产国际还存在的时候，苏联出于外交利益考虑已不再公开宣传输出革命，许多援助行动也转入秘密。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苏东剧变后，各国共产党，除个别小国小党和“左”派组织外，都先后放弃了国际主义旗帜，甚至进行公开批判。中国党也从十三大起正式放弃了这个口号，从此不再提起。但是真正的转折还是在十二大。

为了不割断历史，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十二大报告中提了一句“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从来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但报告把国际主义解释为“深深懂得中国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不能离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也提到国家间的相互援助，特别强调“革命决不能输出”。这与列宁的解释有天壤之别，也不同于马克思所提“工人无祖国”。胡耀邦还把各国间的友好相处也纳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含义中，使两者的结合不再同世界革命相联系，还与狭隘民族主义划清了界限。他1986年11月8日出席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奠基典礼发表讲话时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主张世界上一切国家的青年都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每个青年都应该把自己的一切和祖国的命运联结起来。青年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切。当生育抚养自己的祖国遭受侵犯时，就应该奋不顾身地捍卫她。但是，这是否就是爱国主义最完整的标准呢？这还不够。还要同别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这样一种富有远见的国际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如果中国青年只想到自己的国家好起来，而对我们现行的开放政策不积极，对同日本、同世界一切国家的青年讲团结、讲友好、讲互助互利不热心，那就够不上是很清醒的爱国青年”，“历史上有不少的人，因为只有狭隘的爱国主义，结果变成了误国主义。我希望中日两国青年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把自己锻炼成为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同时又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高尚的现代人。”

在世界革命问题上拨乱反正不只是说说而已。这个时期中国在实际行动上也停止了对世界革命的援助。例如，邓小平采纳了李光耀的意见，中断了同东南亚各国党的关系，停止了对它们的各种援助，包括关闭马、泰共在中国的广播电台、撤出为缅共创建的解放区

中的中方人员等。再就是不但全面彻底终止了对越南的援助，也单方面废除了一切援阿（尔巴尼亚）的协定，立即和全部撤出中国专家。整个对外经援数量也从 1970 年代最高时占我国财政支出 7%左右，一下降到不足 1%。

为了适应对外关系这一个重大战略变化，即告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停止支援世界革命，胡耀邦早在 1979 年 3 月 21 日中宣部召开的有关对外宣传会议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改变对于对外宣传的看法。他说，“宣传国内的东西，目的究竟是什么？过去讲是为了‘促进世界革命’，我看这是大话，现在不宜这么提。”“我们要实实在在地规定我们对外宣传报道的任务，不要硬去加上什么‘提高左派思想’呀、‘争取中间群众’呀、‘分化上层人士’呀……我们搞对外宣传，主要的还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为了创造有利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际条件，也包括尽可能有利于促进国际反霸斗争。”

以上这些都说明，胡耀邦对于作为时代特征的战争、和平与革命的问题，早就有了清醒的和十分肯定的认识。这还可以从他以下的回顾中看出来。1986 年 7 月 20 日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承德学习会上，他就国际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两条政策和中国的论断有没有根据呢？对不对呢？我们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环境，这有没有根据？是否正确呢？我到日本去一看（按为 1983 年），得到了这个印象。这次又到西欧去一看，更加深了我的印象。”这个印象就是：“战争打不起来，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这也是一个事实。简单地说，就是想打的人不敢打，怕打的人更加怕打。少数人想打，想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不敢打。从日本到西欧，对战争的恐惧，那是胜过我们中国人几百倍的。个别人即使想打也是不敢打的，打一场世界大战哪有那么简单呀。”由此可见，当人们还在谈争取战争推迟若干年的时候，胡耀邦早已对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了成熟的看法和更加肯定的信心。



《何方谈毛泽东外交》（简体字修订版）2018 年 9 月

附录五：胡耀邦在对外关系上的拨乱反正

【文 摘】

中国和越南在东南亚的冲突¹

（美）加雷斯·波特

越战以后，东南亚政治的最重大发展是中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共产党人反对美国干涉而组成的联盟解体了，并发生了以中国和越南为主要角色的严重冲突。中越冲突反映了它们歧异的地缘政治观点和两国人民的历史仇恨。中越冲突的根源是中苏之间的全球性冲突，并于这种冲突盘绕纠结在一起。今天中越冲突开始呈现自己的特点。中国深深卷入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战事，它是使中越紧张关系上升到危机点的唯一因素。越南战争初期，中国和越南之间就已存在着严重的政策分歧，但是目前的冲突是因为中国 1971 年决定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而直接产生的。

战后越南仍然把美国视为对安全和东南亚国家间合作的主要威胁，而中国则在私下争辩并公开暗示：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力量对于阻止苏联到这一地区填补真空是必需的。当中国于 1975 年同泰国和菲律宾关系正常化时，中国向他们警告说不要急于要求美国撤出军事基地。同时中国试图建立一个包括美国、泰国、柬埔寨和中国的国家联盟，以抗衡越南在东南亚大陆的影响。当越南共产党书记黎笋 1975 年 10 月访问北京时，中国要求越南同意一项“反霸”条款（菲律宾和泰国在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中已经载入这一条款），但黎笋拒绝了中国的要求，提前结束访问，调子异乎寻常的紧张，既没有通常要举行的越方答谢宴会，也没有发表联合公报。黎笋继续前往莫斯科访问，他在莫斯科谈妥了一项中国不愿承担的经济援助协定。

随后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两个步骤，表明他们对越南极其恼火。第一个步骤是，他们通知越南他们 将不向越南提供进一步的援助。第二，他们用威胁性的语气向越南发出警告说

¹ 此文发表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即将崩溃、中越战争尚未爆发之时。系十年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到的，原文就是中文。无法找到英文原著。我对其中文版做了些整理（本期编者注）。

他们决不允许越南占领南沙群岛的任何岛屿。中国和越南都提出拥有这些岛屿的主权，而北越军队在进行最后攻击时从南越政府手中夺得了这些岛屿。北京显然期望对越南的强硬态度会有助于帮助改变他们认为是越南的亲苏倾向。可是越南更明确地转向莫斯科寻求支持。1976 年，越南一位党的发言人告诉瑞典记者，越南第一次明确地倒向莫斯科，以此来对中国的压力作出反应。然而，造成两国关系进入危险阶段的则是越南与柬埔寨的冲突。柬埔寨已成为中国的亲密盟友并是中国反对越南进一步在东南亚增加影响力的焦点。柬埔寨和中国形成对越南图谋的认识，无疑是由于越南一直是向柬埔寨扩张领土（即十九世纪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以及在殖民时期越南共产党人关于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

自从印度支那共产党于 1930 年成立以来，它曾正式地支持关于在从法国取得解放以后三个印支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成立联邦的设想。越南人在这样的联邦中当然要居于统治地位，因为越南人太多，经济和社会也较发达。随后党于 1935 年和 1941 年作出决议，立下一个原则，即印支三国中任何一国都将有权决定是否加入这样一个联盟或保持独立。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不再谈论关于建立联邦的计划，也从来没有再使之复活起来。尽管如此，柬埔寨现领导人深信越南党的领导人并没有改变他们想建立一个三国联邦的计划。柬埔寨领导人还担心河内的控制，因为越南人直到六十年代还在对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监护，在柬埔寨共产党内越南的影响持续不断。在反抗法国人时期，印度支那共产党介入到柬埔寨，在此之前党内很少有柬埔寨人。到 1951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断定在印支三国中每个国家分别建立共产党不仅是适宜的而且对于在老挝和柬埔寨动员反法斗争也是必要的。但是直到 1954 年，越南人仍然通过原是印支共产党成员的柬埔寨领导人，继续对“高棉人民革命党”的战略、策略加以控制。这些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经常和越南党的领导进行磋商。越南方面说，整个 1950 年代柬越两党都是在执行统一的政治路线。越南提出的策略是支持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因为他奉行反帝政策。这个策略被柬埔寨共产党采纳了。

到 1960 年，这个策略在柬埔寨党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此期间西哈努克发动了一场坚决镇压共产党人的运动，除了约 10% 的党员幸存之外，柬埔寨共产党几乎全部被消灭。幸存的是一些像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这样较年轻的共产党人，他们开始接受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印支共产党内而是在法国。据现任柬埔寨总理的英萨利说，他和他团体中的其他人拒绝了苏联总理赫鲁晓夫 1965 年提出的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反对越南支持西哈努克的政策，认为那是“修正主义”的。当波尔布特 1963 年成为党的第一书记时，柬埔寨党和越南党之间关系的旧格局被打破了。波尔布特 1965 年以党的总书记身份第一次对河内访问，暴露了柬埔寨和越南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一方面，越南人继续敦促柬埔寨人在对外政策上支持西哈努克，而只反对西哈努克的对内政策；另一方面，波尔布特主张开展武装斗争反对西哈努克政权。柬埔寨代表团随后前往北京，波尔布特第一次和中国领导人建立了联系。1967 年 6 月柬埔寨共产党不顾越南的反对，制定了武装斗争的计划。

1970 年，在发生推翻西哈努克的军队政变之后，越南共产党人和柬埔寨共产党人开始了五年之久的合作，柬埔寨人勉强接受了这种合作。柬埔寨领导人知道，如果越南军队在柬埔寨活动，他们党内那些曾经是印度支那共产党成员以及那些反对波尔布特路线的分子的力量就会得到加强。

最初波尔布特要求越南军队（这些军队在 1970 年 3 月和 4 月初巩固了对整个东部边界地区的控制）离开柬埔寨而只留下一些军事顾问。柬埔寨共产党同意了与越南人合作，可是誓言要继续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同越南人“斗争”。

战争期间柬越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根源，是四千名左右的“高棉越盟”回到了柬埔寨。这些人曾反抗过法国人，而在解决印支问题的 1954 年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后逃往北越。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需要这些越南训练的柬埔寨干部来组织一支有效的柬埔寨军队，但他们又担心这些干部会打乱他们运动内部的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倾向越南的一派。

1973 年波尔布特集团开始在军队进行有选择的清洗，撤换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杀害这

些“高棉越盟”成员。

在战后最初的几个月里，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睦的，尽管 5 月初柬埔寨占领了富国岛和土珠岛，而越南人月末就击退了柬埔寨人。1975 年，在波尔布特于 6 月访问河内和黎笋于 8 月访问金边时，两党领导人讨论了两国未来的关系。越南人要求同柬埔寨在他们历史上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特殊关系”。他们寻求柬埔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给以合作，包括反对他们认为是美国搞的军事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并且提议向柬埔寨提供技术援助和同柬埔寨进行经济合作。柬埔寨拒绝了这些建议，而提出签订一项友好条约来处理贸易、自由越过边境以及解决边界问题。

在柬埔寨拒绝越南关于在外交政策上采取共同立场的请求之后，柬埔寨于 1975 年 8 月同中国达成了一项联合公报，这个联合公报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对世界事务的观点。联合公报遵循中国先前的声明，说“超级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从而使柬埔寨坚定不移地置于中国阵营之中。这显然终结了柬埔寨党内关于公开和中国结盟的问题的争论。从此柬埔寨就不再提同越南签订友好条约的主张，尽管越南表示有兴趣继续进行谈判。

柬埔寨决定公开同中国站在一边，可能是与柬埔寨 1975 年开始大力加强武装力量有关。据越南方面的消息说，柬埔寨军队增加了十二个师，由中国在装备和训练方面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尽管柬埔寨领导对越南的政策已经不可逆转地变得更冷淡和疏远，新的民主柬埔寨国家还是于 1976 年同意和越南就他们的共同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1976 年 5 月，双方代表团举行预备性会议并达成协议，陆地边界按照法国最后绘制的印度支那地图划定。双方还同意对岛屿主权的决定将以布雷维线（Bervio Line）为基础，这条线是一位法国殖民行政长官于 1939 年为在柬埔寨和在交趾支那的殖民政府划分泰国湾东部五个岛屿的行政职责而作出的一项决定。但是越南不接受柬埔寨的一项要求，即布雷维线也应被接受来作为两国之间的海界。

越南争辩说，这条线从来不是要用来界定海域的。越方坚持要进一步谈判来决定海界，柬方则认为这更加证实了他们对越南试图要夺取柬埔寨的部分领海的担心。柬领导人把布

雷维线视为他们不可改变的立场，他们同意西哈努克的观点——柬埔寨在领土问题上作出最小的让步，都会产生一种“对其邻国的扩张主义目标的软弱感”。虽然柬埔寨领导人继续尊重与越南的“团结”，双方却从未恢复关于边界的讨论，而是开始准备将来对抗他们强大的邻国。

1976 年，柬埔寨领导人所担心的倒不是越南的军事侵略，而是在他们党内和政府内对于对外政策的反对。因此波尔布特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劝阻对原朗诺政府人员的报复。除中国外，拒绝外国在医务和其他方面的援助，并且对在他们中间存在的“间谍和破坏分子”采取一种近乎偏执狂的态度。结果内部普遍的意见分歧，特别是在军队里情况更是这样。越南训练的干部在军队里仍然身居高职。反对派势力策划了一次政变，但于 1976 年 9 月被政府发现。

事情过后不久，柬埔寨说这次阴谋是由越南人通过“他们很早以前招募的代理人”——显然是指原印支共产党成员和在越南受训的干部——发动的。阴谋的发现促使波尔布特集团对党和军队进行了一场新的、更彻底的清洗，以清除一切有亲越倾向之嫌的人。

据越南人说，到 1978 年初，几乎所有自 1970 年起从越南回国的干部都遭到处决，而且在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二十名委员中有五名中央委员和一些高级军事司令官也被杀害了。与这场清洗同时发生的是 1977 年 1 月柬埔寨武装力量对越南边境的居民点猛烈的攻击。与此同时，柬埔寨终止了在柬埔寨和越南边境省份的联络委员会的一切接触。柬埔寨共产党对越南提出的关于立即举行高层次谈判来制止边界进攻的建议置之不理，理由是越南必须先停止“侵略”，以便创造“相互信任”的必要气氛。

越柬之间的战争必然带有中国和越南之间关系各个方面的色彩。两国之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越南对待约 110 万华人的问题。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在 1975 年更加紧张了。河内开始担心这些华人以及住在中国边境地区的、种族上属于少数民族的忠诚问题。当河内于 1977 年初加紧控制这些人时，中国提出了抗议。中国感到愤怒，因为河内把西贡政权强迫华人入籍当作既成事实全盘接受了下来，而不是像 1955 年两国之间达成的协议那样，在南

方解放后同中国进行协商。

但是，促使中国决定与越南进行公开大论战的是，在越南对中国在柬埔寨的作用日益不满的情况下，越南于 1978 年 3 月决定没收堤岸华商的财产。许多南方的华人开始逃离越南。不久，在越南北方和南方的华人社会里传出谣言说，由于中国支持柬埔寨，华人将成为越南报复的目标。

随后，越南人指责中国大使馆 4 月份参与从难民搜集的有关这次阴谋的情报（见安东尼·保罗《走漏出来的阴谋细节》，载《远东经济评论》1978 年 5 月 19 日）。关于柬埔寨的指责，见金边电台 1978 年 1 月 15 日和 24 日广播。

当逃离越南的华人增加到二十万人时，北京第一次公开攻击越南“歧视、迫害、驱赶华侨”，并单方面宣布中国要派船到越南接运“受迫害的华侨”。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中国有计划地把同越南的关系降到最低点，从越南撤走了中国援建的工程，并最终关闭了边界。越南也对中国在柬埔寨的政策作出反应。

1978 年初，越南开始庆祝十三世纪陈兴道和十五世纪黎利抗击中国入侵者的胜利。河内电台警告其他东南亚国家提防中国试图利用华侨作为干涉它们内政的手段。越南的一个评论说，“今天中国要逼迫越南追随它的路线，明天它也将会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中国为此作出反应，指责越南谋求“区域霸权”，充当“东方古巴”，是苏联控制东南亚阴谋的“小伙计”。根据中国的看法，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战略是在越南取得海军基地。5 月，香港一家亲北京的报纸报道说，越南已经让苏联使用金兰湾的巨大海军基地和海防港。美国权威人士说，美国使用了先进方法加以核对，发觉这个断言并不确实。事实上，中国并不想在中国报刊上提出这项指责，中国人在私下把苏联在金兰湾设立基地一事说是将来的可能性，而不是现在已成为现实。然而，与北京对苏联控制这一地区的计划所表示的惊恐相反，在主要大国中苏联最少有能力在东南亚施加影响。非共产党的东南亚国家往往把苏联视为局外人，对于苏联的观点所予以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待中国、美国和日本的概念。非共产党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关注远超过对苏联的关注，因为中国同在泰国、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浩大的华人社会有关连，并同在缅甸、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共产党反叛分子有联系，而且还因为中国支持泰国和菲律宾的政策。对比之下，苏联对于东南亚的共产党实际上不具有影响力。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缅甸的共产党显然是倾向中国的。

从历史上来看，苏联同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共产党并未曾有过联系，因为越南人坚持认为，他们能够处理同这些共产党的关系，而不需要苏联插一手。但是尽管苏联和越南在反对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方面是一致的，他们在其他对苏联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分歧。苏联领导人要求越南和苏联集团搞经济一体化，越南是在当了若干年观察员之后才最终于六月份加入适应苏联需要的经济组织——经互会（见钱达《狼的退出》一文，《远东经济评论》1978年5月19日，钱达《偶然事件引起战争的危险》，《远东经济评论》，1978年7月14日）。


关于金兰湾的谣传最初是在三年前出现的（见《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5年5月30日——杰弗里·朱克斯《关于苏联和东南亚的关系》、《苏联人和东南亚》。《亚洲观察》1975年8月号 霍恩《1977年东南亚事务》、《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机会和障碍》）。但是，越南决心要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以便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并阻止美国和中国勾结起来反对河内。尽管苏联反对越南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组织建立联系，因为这会削减越南对莫斯科的依赖，然而，越南已同法国、日本以及世界银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将来越南的经济可能将日益面向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的资金来源、技术和配件，而这将大大削弱苏联和越南的关系。预计，随着越南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越南可能会在反对美国军事力量在东南亚的存在方面采取较温和的态度。

中越冲突还影响着东南亚的其它国家。老挝和越南，由两国间长期合作的历史有着一一种“特殊的关系”，因而处于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又试图在其邻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老挝曾邀请约二万五千名越南军队来帮助它维护安全，以对付原先美国支持的部落军队和老挝王室军队。据信，苏联在老挝有一个规模最大的援助计划，在那里派

驻了约四千名技术人员。

1977 年 4 月，1 万 8 千名中国军队和工人完成了连结云南和老挝北部的公路工程，而万象拒绝考虑中国关于在老挝中部和南部帮助修建其他工程的建议。但是，老挝似乎决心避免在地区冲突中有所偏袒。现在，中国和越南也在相互竞争对非共产党的东南亚的影响力。1976 年年中，越南从战后初期对东盟的敌视态度，开始转而接受东盟为一个独立的非军事组织。在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以后，越南在与东盟的关系方面采取了一项新的重大主动——议谈判签订一个“和平与中立区”的协议，这个协议类同于 1971 年东盟自己采纳过的计划。如果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话，它将突出越南的这个论点，即东南亚国家应不受外界大国的干涉而解决它们的问题。

这个协议将在损害中国的情况下增强越南在区域政治中的政治作用。中国现在关心的是，在反对苏联的基础上，在本地区坚持一条明确的界限。中国对越南的建议作出反应，指责河内玩弄“卑鄙的特洛伊木马计”，指出越南对东盟态度的改变并非真心诚意。

柬埔寨的英萨利把越南的这个举动称为是“包围柬埔寨”的又一次努力，并说他的政府将不参加东盟，也不参加任何集体安全集团。越南的这个建议预示着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成为本地区剧烈的政治活动的主题。

原载美国《当代历史》1978 年 12 月号

【资 料】

毛泽东、周恩来与西哈努克、乔森潘、英萨利的谈话

1974-4-2

人物简介：

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 柬埔寨王室亲王，1960 任柬埔寨国家元首，1970 年 3 月朗若集团政变后流亡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1974 年波尔布

特上台后就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1976 年 4 月辞职。1981 年 3 月领导成立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并担任主席至 1989 年 8 月 27 日。1982 年 7 月 9 日就任民主柬埔寨（1990 年 2 月 3 日改名柬埔寨王国）主席。1991 年 7 月 17 日被选举为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主席。同年 10 月 23 日率柬埔寨全国最高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巴黎会议，签署“关于全面政治解决柬埔寨冲突的协定”。11 月返回金边后被全国一致拥戴为国家元首。

乔森潘（Khieu Samphan） 1967 年加入红色高棉队伍，成为仅次于波尔布特的二号人物。红色高棉政权溃败后从 1985 年起，乔森潘在名义上取代波尔布特成为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1998 年，乔森潘和农谢宣布向柬埔寨政府投降，正式结束了红色高棉武装斗争。2001 年，乔森潘被列为红色高棉受审名单的第三位。2014 年 8 月 7 日，由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法庭判处乔森潘终身监禁。

英萨利（Ieng Sary） 红色高棉政权三号人物，2007 年 11 月 12 日与夫人英蒂利（红色高棉另一大人物）被柬警方逮捕，在为红色高棉历史问题所设立的特别法庭接受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罪行的指控。

乔森潘：我们有进行长期战争的一切条件。对此人民精神上是有准备的，经济条件也已具备，粮草和衣着都能自给自足。目前的国内形势表明，我们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毛泽东：长一些好，长期打。如果是短期胜利，那也好嘛。

乔森潘：对。

毛泽东：你们打了几年？

西哈努克：4 年零 1 个月。我们是从 70 年 3 月开始打的。

毛泽东：再准备 6 年吧，一共 10 年。就是这种想法，至于如果只要 4 年或者 3 年解决问题，也好嘛。 西哈努克：很对。

毛泽东：我们打了 22 年，犯过很多错误。哪位是英萨利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呢？

英萨利：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观点，准备进行长期斗争。正像乔森潘副首相说的，目前已经具备了较快取胜的条件。

毛泽东：你们对两位亲王，还是要打倒他们，还是要团结他们？（众笑）

乔森潘：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没有理由打倒他们。

西哈努克：主席阁下是指将来。（众笑）

乔森潘：团结起来是为了以后共同打倒帝国主义，重建中立和独立的柬埔寨。

毛泽东：哎。

英萨利：在中国和越南援助下进行的柬埔寨革命具有自己的特点。我们的革命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即不排斥任何阶层。我们有一切理由把大家团结起来，而没有理由排斥一个阶层。

毛泽东：要排斥朗诺集团，要团结两位亲王。我赞成你们的方针。你们两位亲王呢，也不要打他们（指英萨利和乔森潘）。（众笑）

西哈努克：柬埔寨解放以后，我将完全退出政治生活。这一点，我曾多次公开声明过。

英萨利：我们认为西哈努克亲王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受了考验，参加了救国斗争。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也是我们国内的意见。我们认为柬埔寨政体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就是要有真正的民主。这一点，我曾多次向国家元首和首相说过。最近我们国内也表示同意我这个意见。

毛泽东：你们国内领导人叫什么名字？

英萨利：胡荣、符宁。

西哈努克：还有宋成，他是参谋长。

毛泽东：我说共产党呢。

西哈努克：这些都是共产党。

周恩来：主席说的是头子。

毛泽东：我也没见过。

西哈努克：还有普里萨拉亲王。我们是统一阵线，统一阵线内部没有党派，柬埔寨的共产党人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从未建立一个党，只是宣布支持阵线的政治纲领。

英萨利：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是由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的。

西哈努克：有沙罗特绍（波尔布特）、农谢和宋成。

英萨利：成立了一个集体领导的军事委员会。乔森潘是这个委员会的领导人。现在他出国访问了，就由宋成指挥了。

毛泽东：不要那么吞吞吐吐，就是直说。他们两位（指乔森潘和英萨利）是代表共产党。他们两位（指西哈努克和宾努）是代表另一个党。两个党联合起来就是为了打倒朗诺反革命党。不吞吞吐吐好，讲真话。统一阵线的领导者是他们两位（指两亲王）当，还有他（指英萨利）。（对乔森潘）我看你也像个共产党吧（众笑）。不要瞒了两亲王嘛。

周恩来：两亲王都知道你们是共产党，但他们还是愿意跟中国友好。

西哈努克：战争结束以后，解放以后，我们之间也不会吵架。宾努亲王和我一直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柬埔寨共产党人巩固人民革命的成果。国内的政权已经转交给人民了。我已经把政府、行政、军队和警察都交出来了。我们已经实行了变革。战争结束以后，即使我愿意打倒柬埔寨共产党人，也不可能了，因为军队和政府都不在我手里。我什么都没有了。当初朗诺打倒我，就是因为我把军队交了出去，当然也包括警察。金日成主席对我说，如果当初军队在我手中，朗诺是不可能发动政变的。谁有军队，谁就有政权。我现在和柬埔寨共产党人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战斗在一起。我对未来毫无野心。我认为将来权力应当归他们，他们是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应当掌权。有人说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分子都到哪儿去了？他们原来人数很多，而现在阵线内部西哈努克分子占的比例太小，不平衡，共产党人包揽

了一切事务。我回答说，原来的西哈努克分子都去支持朗诺和尼克松了，不再和我在一起了。因此将来独立的、拒绝任何外国统治的柬埔寨由共产党来掌权是完全正常的。

毛泽东：这样好嘛。

西哈努克：谢谢主席。柬埔寨共产党人对我也很好。他们说不需要改变政体，改称柬埔寨共和国。柬埔寨国家有自己的特点，应当保留王国的称号。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容。

阁下在 1970 年就已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国家，但支持柬埔寨王国。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内容，中国不支持阮文绍的南越共和国，也不支持朴正熙的大韩民国。柬埔寨王国是革命的，现在政权不在我这个亲王手中，而在人民手中，实行真正的民主，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邪恶势力而斗争。柬埔寨共产党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同意保持两千年的王国正统形式，保留了王国的国旗和国歌。事实上柬埔寨已经进入革命时代。我只是国家元首，并不掌握政权。我完全同意由人民掌权，也就是说由人民的代表——乔森潘和他的班子掌握政权。我已经正式表过态，认为应当由他们掌权。以后不会发生内部动乱，我不会为此和他们吵架。

毛泽东：吵架总是要吵的，不过不要分裂。小吵架，大团结。（众笑）

西哈努克：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我说的吵架，是指近乎内战的严重局面。

毛泽东：不是那样。

西哈努克：战争结束以后，重建柬埔寨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无休止的争吵。国体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柬埔寨共产党人也公开表示了意见。我们在历史上是个王国。我倒也愿意成立共和国，但我本人是个亲王，即不能背叛祖先，又要对得起人民，因此我同意保留王国。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质，就是建立人民的政权。现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毛泽东：你倒很慷慨。

西哈努克：不是我慷慨，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形势自然发展的结果，这种形势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各方面的爱国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局面。正像英萨利特使所说的，柬埔寨革命与其它革命不同，有自己的特点。

毛泽东：我们这个党内也吵架。50 年，我们已经吵了 10 次架，最近一次是跟林彪。林彪没有他们（指两亲王）好啊，林彪坏透了！你们的事业会成功的。但是我有点怀疑，比如：说 90%的土地（已解放），哪有那么多啊？

周恩来：还有人说 80%，是不是有那么多？

西哈努克：不是宣传而是客观地说，解放区实际上可能有 550 万人口，朗诺占领的地区，主要是金边等大城市有 200 多万人，包括马德望、磅湛，磅湛倒没有多少人，还有西哈努克城、磅同等，加在一起可能有 200 万。解放区的人民都是生产者，而朗诺的 200 万人多数是消费者。为此，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增加给朗诺的援助。战争继续 1 年，援助增加一倍，这事和财政援助都得增加。大米、肉类等都用飞机从美国运来。因此朗诺的共和国是靠美帝、美国人为地维持着。我们在战斗方面的困难是，尽管中国经常给我们很多援助，但军事装备运输困难，没有海军、空军和坦克。在这方面，朗诺占优势。朗诺还有重炮，我们也有一些大炮和炮弹，但都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另外还有雇佣军，尼克松组织了泰国、老挝、南越的雇佣军，这些人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现在，越南兄弟已不再帮助我们打仗了，他们要执行巴黎协定。因此我们在战争上完全靠自己，那只有柬埔寨人在战斗。美国说还有越南人，我们说没有。我们要越南人不必再帮助我们战斗，只要求他们在运输方面提供援助。

毛泽东：这样好，自力更生。

西哈努克：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

毛泽东：我们过去也没有坦克，没有海军，没有空军，只有陆军。打了 18 年，跟蒋

介石打，跟日本人打。后头和平了又打，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不过我们出的是志愿军。加在一起 25 年。我这个人读了 6 年孔夫子，读了 7 年资本论，根本不知道什么马克思、列宁。还没有你们两亲王这么进步呢（众笑）。后来蒋介石杀人哪！我们 5 万人，杀了 1、2 万。革命失败，投降蒋介石一部分，消极不干了一部分，剩下 1 万人左右。结果蒋介石也打败了，日本人也打败了，美国人也打败了。十月革命教育了我。主要是蒋介石杀人啊。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是个娃娃头（众笑），从来没有想还要上山打仗啊！蒋介石杀人哪，城市里头呆不住啊，逼上梁山。打了 10 年，打出一点经验，不当小学教员了。日本人来了，又打了 8 年，然后又跟蒋介石打了 4 年，然后又跟美国人打了 3 年。

周恩来：25 年。

毛泽东：所以我今年 81 了，有 20 多年消耗在打仗上。这个打仗，一打就学会了。（众笑）

西哈努克：很对。

毛泽东：不打就不懂呢。

英萨利：过去我们只是看主席的书，现在正通过亲身经验体会。

毛泽东：主要是经验，自己打。所以你们要形成一个拳头，能够打到占领金边，打到大城市，我看大概要 10 万军队。要把手捏成一个拳头，不是游击队，要正规军。

乔森潘：我们有正规军。我们在武器装备上与敌人相比处于劣势，为了弥补这个弱点，我们在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开展群众性的政治工作。现在金边城里的人民斗争运动开展得很顺利。

英萨利：我们现在有三支部队：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越南同志认为，我们的三种武装力量发展得都很快。面前我们的正规军差不多有 10 万人了。

毛泽东：嗯。

乔森潘：我们的正规军、地方部队和民兵合起来约有 20 万人。

英萨利：我们军队的主要建制是营和团，现在我们还没有成立师，因为指挥问题较复杂。现在越南同志在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现在已经有七个妇女营，在西北战场上有两个妇女营直接参战。这些女战士很勇敢，她们往往要等到敌人的坦克到了 50 米的距离才发火箭筒。有时火箭筒不好用，敌人的坦克就压了过来。所以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50 名女战士，另外有 6 名女战士被俘。他们宣传这件事，我们核实了，确有其事，但是在这场战役中我们消灭了敌军六辆坦克，因为有其它营配合作战，包围了这些坦克。

毛泽东：那好，不错。要建立几个军，每个军要有三个师，每个师要有 15000 人。这种军队就是学校呢。我就没有上过大学，但是我也上了大学，而且上了 20 几年，叫绿林大学。（众笑）

西哈努克：这是最好的大学了。

毛泽东：又搞军事，又搞政治，又搞调查研究，农村、中小城市、分配土地问题。你们分配土地了没有？

乔森潘：我们现在国内已经采取措施，取消农民高利贷的负担。

毛泽东：要减租减息。

乔森潘：我们那里没有分土地，因为生荒地很多。

毛泽东：那是几年之后。农民不得土地，战斗力不会提高的。站在朗诺一边的地主不打倒，农民的积极性不会很高。

西哈努克：现在解放区已经没有地主了，人民政权把原来地主的财产分掉，现在解放区已经没有地主了，人民政权把原来地主的财产分给农民了。当然，成立新政权以后不久，人民把少数地主干掉了，其它的地主都跑到金边城里或逃往法国了（众笑）。另外，实业家、大资本家也是这样。至于这些人的财产，小工业家的被当地的农民分了，稍大一点的

由国家、人民政权经营。

毛泽东：对资本家就要谨慎。只有买办资本可以没收，如果是民族资本，就不忙啊。

西哈努克：对爱国资本家，我们不着急。

乔森潘：民族资本家同我们站在一起，农民中的富农也和我们站在一起。

毛泽东：不仅富农站在一起，还要团结一部分中小地主。

乔森潘：爱国者。有些地主甚至自愿地交出土地，因为没有劳动力。

英萨利：我们甚至对买办也区别对待，我们只反对为美国人工作的买办，争取另外一部分买办支持我们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买到药物和别的东西。

毛泽东：这好，不错啊。

周恩来：我听说法国人的橡胶园给他们缴税。

乔森潘：我们现在自己经营过去的橡胶园，割胶完全由我们自己的工人做了，然后再卖给法国人。

英萨利：法国人收购的价格很低，1 公斤才给 30 个里尔。但我们又不能不卖，因为产量很大，如果不卖就放坏了。所以有些船挂上白旗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解放区来做买卖。有些船进来时还带上汽油。

毛泽东：那好啊，交换啊。

西哈努克：是的，以货换货。

英萨利：但真要换货，法国人又怕，害怕朗诺。

乔森潘：我们有时从他们那里弄点汽油和其他工业品，另外设法卖出橡胶。但是法国人给我们朗诺的货币，经常贬值，不值钱了，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同法国人也有斗争。

毛泽东：噢。叫他们给美元，dollars（美元）。

英萨利：过去法国人给过一次美元，后因怕朗诺，不敢给了。

毛泽东（对英萨利）：你这次回去，去了多久？

英萨利：3 个多月。去了很多地方，4 号公路、5 号公路、1 号公路、原来的橡胶园都去了。现在我们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一块完整的地区了，在内部来去自由，是一块独立的地盘，帝国主义在外边进行侵略。敌人在城市里也是受包围的。磅同由于我们自己的疏忽，一度曾使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吃了点亏。

西哈努克：因为金边的战斗把一部分兵力吸引过去了，所以磅同的人就出来了，否则敌人只能龟缩在城市里，很被动。我们把正规军动员起来应付金边战场。

乔森潘：说法是在磅同，如果我们的干部提高警惕，也能通过游击活动保护人民，袭击来骚扰的敌人。但由于我们的疏忽，没有做到这一点。

毛泽东：总是要犯点错误的，不犯错误不可能啊。

乔森潘：问题是要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后来我们利用这个时机又动员了一次，推动了我们各地干部的工作。

英萨利：主要是因为朗诺的大炮和弹药都少，很少炮击解放区后方，所以我们的后方有点像太平地区。这就有必要推动干部。

西哈努克：敌人有时和我们争夺老百姓，但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比如在磅同的问题上，他们争到了一些居民，但原来的生产者变成消费者，就不得不要求尼克松多给美元。

毛泽东：原来在中国学习的，叫纳拉迪波吧。

西哈努克：对。他现在还在金边。

毛泽东：能不能出来呢？

西哈努克：由于他参加反对美帝和朗诺的斗争，被判了 5 年劳役。在监狱里住了 3 年多以后，他得了精神病，就被放出来了。我母亲离开金边来中国时，纳拉迪波的外婆不让他走。我还有两个孩子在国内解放区，和乔森潘在一起。其中一个经过 3 年，病死了，一个还在。另外有个孩子在法国。剩下的现在都在中国，在我身边。朗诺那边现在只有纳拉

迪波一个。

毛泽东：好，不谈了吧。（对总理）你们谈吧。少谈些，不要详详细细什么都谈，把大纲节目谈一谈就行了。

西哈努克：主席阁下长时间地接见我们，使我们深感荣幸。消息公布后，全体柬埔寨人民，特别是正在斗争的战士和干部，都会受到极大的鼓舞。乔森潘回国后，一定会把谈话的精神带回去，干部、战士听了都会很高兴。

毛泽东：供你们参考了。我还是劝你（指西哈努克）读一点马克思和列宁。

西哈努克：我有时读一些摘要。

毛泽东：比如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我总是希望你进步，你们两位（指两亲王）不要学中国出林彪这类人。朗诺就是林彪。朗诺亲美，林彪亲苏。

西哈努克：我们是亲柬埔寨的。

毛泽东：对了。第三世界要团结起来，人多啊！

西哈努克：我们怀着最大的信心，坚决走这条路。

毛泽东：帝国主义怕呢！

西哈努克：很对。

毛泽东：完了。👉

【资 料】

毛泽东与波尔布特谈话记录

时间：1975-6-21 下午 5:30-6:20

地点：中南海

其它参加人：柬方——柬共中央常委英萨利，柬共中央委员、军需军备大臣明山，柬共中央委员杜姆，柬共中央委员、东部地区副书记彭；

中方——邓小平 翻译——谢月娥、齐宗华 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同波尔布特热烈握手）



波尔布特：向毛主席致敬！

毛泽东：欢迎你！

波尔布特：谢谢！

毛泽东：Very welcome（非常欢迎）！

波尔布特：我们今天能在这里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非常愉快！（毛泽东同英萨利握手）

毛泽东：（伸出两个手指）第二次见面了！

英萨利：祝毛主席长寿！

毛：“我们是第二次见面了！”

毛泽东：（手指柬方人员）Long live you（你们长寿）！（毛泽东同明山握手）

明山：毛主席是杰出的领袖！（毛泽东摆手，毛泽东同杜姆握手）

杜姆：向毛主席致敬！（毛泽东同彭握手。宾主入座）

毛泽东：我眼睛不行，腿也不行，讲话也不行。不行了，靠你们！

波尔布特：我们很愉快地接受。我们很高兴能会见主席。

毛泽东：你们的作战、war（战争）、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一战线，我不谈了。（指邓小平）我赞成他的。他说你们是正确的。

波尔布特：谢谢。主席这样说，使我们感到很温暖。

毛泽东：我们赞成你们啊！你们很多经验比我们好。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50 年犯了 10 次路线错误，有些是全国性的，有些是局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这四次跟苏联没有关系。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六次都跟苏联有关，反对我们，分裂党。可是他们都失败了，党没有分裂，把他们排除出去了。所以我说中国没有批评你们的资格，只有赞成你们。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rectification（纠正）。这些我都不谈了，由这位姓邓的去谈（笑）。我要谈一点，就是你们现在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道路，socialist way（社会主义道路），两种可能：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要搞资本主义。以后 50 年或者 100 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1 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到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有两条路线斗争。不然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立的统一，unity of opposites（对立的统一），只说一个，就是形而上学。两个，unity of opposites（队里的统一），struggle of opposites（队里的斗争）。我相信马克思说的、列宁说的。道路是弯弯曲曲的。苏联从列宁时代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不同了，将来一定还会回到列宁的道路。中国也是这样，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工资不相等，在平等口号的掩护下实行不平等的制度。我们现在就是这样。还要多少年还是这样，然后才能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有两条路线斗争，先进和落后的斗争。现在还不能讲得完全。这些我们是在报纸上公开说的。我没有话了。

波尔布特：我们很荣幸今天能到这里向毛主席致敬。我们一贯很尊敬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你的著作指导了我们的革命，直至我们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今天我们能在这里亲自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同我们谈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带战略性的问题。今后我们一定要遵照你的话去做。我从年轻时起就学习了很多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毛主席有关人民战争的著作。在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时，毛主席的著作指导了我们全党。

我们在实际斗争中加以运用，取得了效果。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学了《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作，坚定了我们的斗志。中国解放后，我们也很注意学习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人民的经验。我们很注意阅读介绍中国经验的文章。毛主席刚才讲的关于路线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嗯？

波尔布特：我们在党内也进行学习，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毛泽东：不要完全照抄中国。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克思自己说的。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他会做翻译，他翻译的《天演论》上面说的。他不说是翻译，而说是达旨。这一本是这样，其他的比如政治经济学等等都是一字一句翻译的。这本书（指《天演论》）是赫胥黎写的。Huxley（赫胥黎），他是英国人，拥护达尔文的。他自称为达尔文的“咬狗”。不可知论就是他说的。德国人康德就是不可知论。赫胥黎说康德是不可知论，只能认识表面，不认识本质。他（注：指赫胥黎）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是唯心主义，他赞成印度的佛教哲学。所以马克思说他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我对别人没有讲过这么多话，跟你们讲。

波尔布特：谢谢。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光荣。今天毛主席接见我们，同我们谈这么多的内容，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党和人民把它看作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再次表示深切的感谢。

毛泽东：不要谢我，要谢马克思、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 30 本书，印成大字的，送给你们。马克思、列宁他们说得好，比我好。

波尔布特：我们高兴地接受。我们要努力学习这些书，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运用。我们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毛泽东：我不满意自己。好，谢谢你们。

波尔布特：我们向毛主席告辞了。祝毛主席长寿！我以代表团、全党和全体战士的名义祝毛主席长寿！告辞了。

毛泽东：谢谢。

波尔布特：再见！

英萨利：祝毛主席健康！

（毛泽东同柬共各位一一握手告别）。👉

【资 料】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邓小平摘录

唐钦周译 1980. 08. 21

.....

问：邓先生，你是否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扬了国际主义？

答：可以这样说，但，同样重要的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家长自居，没有共产党自认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没有所谓核心存在，也没有谁是大老板。苏联共产党不再是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党了，我们认为苏联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由于苏联共产党统治着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究竟苏联共产党是否真正的共产党，很值得怀疑。

问：不错，我的意思是在今日的世界里，武装冲突只发生在共产国家阵营内，而在另



一个阵营，除了阿拉伯国家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仇视的程度，没有像共产国家阵营里敌意那么深。苏联和中国互相仇视，中国和越南也互相仇视。

答：你要讨论越南问题吗？那么听我说。从全球战略观点来判断，越南紧跟着苏联的步伐，正如我不断指出，越南已经成为东方的古巴，越南强占了老挝和柬埔寨，

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反省，越南究竟是怎么样的国家？我们找不出半点理由可以解释越南为甚么会反过来对抗中国。在越南为民族独立从事长期斗争中，中国提供了不少援助，无私的援助。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越南的事情，也从来没有干涉越南的内政。在那些日子里，你知道我们向越南提供了多少援助？整整二百亿美元，对中国这个贫穷国家来说，是很重大的负担。

问：是的，但你们接着又在一场小规模战争中互相残杀。

答：对的，我们对越南发动了一场自卫还击战。不过，回顾事件的发展，不得不指出效果并不理想，许多国家不赞同我们的做法。我们已着意克制。然而，这次行动表现了我们敢于捋老虎须的决心，我们也保留了再次教训他们的权利。

问：这是当代的创伤之一。邓先生，我们曾为越战感到痛心，为反对越战而奋斗，现在，有人不禁要问：我们过去错了吗？

答：不，不！我们没有错，我们从未后悔站在越南的一方，援助越南是正确的，假使再有国家要对抗外国侵略，我们仍会加以支援。不过，今天越南的情况刚好反过来，我们不得不应付这种局势。

问：对，不过，邓先生，中国也会受到谴责的，你们怎么可以站在波尔布特的一方呢？ 答：

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认清事实。谁解放了柬埔寨？谁把美国人和朗诺政权驱逐出柬埔寨？难道不是由波尔布特所领导的柬埔寨共产党吗？西哈努克亲王没有军队，他被自己的人民推翻了，虽然这样，他开始流亡后，中国仍然继续支持他，并欢迎他在北京作客，但，在柬埔寨境内作战的并不是西哈努克，而是由波尔布特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几乎完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波尔布特战胜了。你知道吗？中国运往柬埔寨的支援物资大部份给越南拦途截定了，中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因此支援物资一定要途经越南，而越南就利用这种机会上下其手，这些物资从未运抵柬埔寨。

问：但波尔布特……

答：我知道你想说甚么。没错，波尔布特和他的政府犯了严重错误，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当时已经了解这一点。回顾过去，也许我们有责任，没有向波尔布特指出他所犯的错误。我们对波尔布特也这样说。事实上，我们一贯的做法是避免对其他政党或国家的事务作出评论，因为我们不想别人误会中国干涉别国内政，无论如何，今天的问题是：谁在对抗越南？西哈努克亲王完全没有军队，其他的几股势力，像宋双所领导的军队，规模太小，起不了甚么作用。真正与越南作战的是波尔布特军队，柬埔寨人民也追随波尔布特。

问：我不相信，邓先生，柬埔寨人民会追随波尔布特，波尔布特屠杀他们，以恐怖手段毁灭他们？怎么可能？你说波尔布特犯了错误，但灭种绝不能只说是错误，波尔布特这样做了，他杀掉了一百万人民。

问：你的数字完全不可靠，柬埔寨只有四五百万人，他杀掉了一百万？真是无稽之谈。你不相信柬埔寨人民追随波尔布特，我也不相信波尔布特杀掉了一百万人，他杀了一些人，而且数目不少，这是事实。他把城市居民赶往乡村，触怒了人民，这也是事实。但，仍是老问题，今天谁在战斗？谁得到群众拥护，谁的力量不断增长？反对波尔布特，或试图分化他们，只对越南有利。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不尊重事实，为什么不容许波尔布特纠正他的错误。

问：恐怕我也是不尊重事实的人，邓先生，波尔布特若是真的愿意纠正错误，要让我相信，那请他使所有被他杀掉的人复活过来。我还想补充一点：我明白你的现实主义，但，邓先生，你怎么和这种人混在一起？我并不单单是指波尔布特。弗朗哥去世的时候，最先致送花圈的是中国，而且由周恩来具名。

答：是这样的，我们致送花圈的时候……请留心，想着的不是弗朗哥，而是西班牙人民，我们希望改善中国政府和西班牙人民的关系，我们对某一个人的观点，并不影响我们

的做法。对弗朗哥的历史评价，我们并未改变，对日本天皇也是一样，我们仍然和日本维持友好关系，我们不能把过去的问题和目前的现实混为一谈。

问：皮诺切特（译按：当今的智利军事强人）并不是过去的问题，邓先生，他是当今的人物，阿根廷独裁者也不是过去的问题，他们是当今的人物，可是你仍然和皮诺切特与阿根廷的独裁者打交道，这还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吧了。

答：阿根廷的情况不同，这个国家日前由军人统治，我们的交往是以国家为对象，处理这种问题时，我们把人民和国家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这是我们的原则。谈到智利，我知道许多进步朋友不了解我们对智利的态度，坦白地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那儿做了好事，让我再解释一下，阿兰第（前智利总统）是中国的朋友，我们仍然怀念他，虽然他受苏联影响，我们仍然当他是朋友。

事实上，周恩来总理曾忠告他：不要追随苏联，不要采取极左政策，否则会孤立自己。阿兰第遇刺后，智利的民主势力遭遇重大困难，我们研究过是否应该维持设在智利的大使馆，还是和智利中断关系。后来我们决定继续维持外交关系。在处理这种微妙和复杂的问题时，我们应该有远见，要作长远打算，并考虑整体利益。此外，还要非常谨慎和有耐性。上面所谈到的决定是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作出的。我虽然没有参与其事，但我认为他们的做法是对的。你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记者，你可以对国际事务发表你的意见，作出你喜欢的选择。但，如果你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責編：方惜辰

封面設計：鄒 行